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委员:王莹 张耀 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编:姚敏杰

副主编:张耀

责任编辑:王文竹 宋亚颖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二府街 27 号

邮编:710003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Ve.xdwy.com.cn/difangzhi

E-mail:zhangyao55@sohu.com

电话:029-87296801

志鉴动态

- 市地方志办主任冯艳阳到长安、新城、未央三区
调研指导工作 (40)
- 《周至县林业志》通过二审 (40)

文史拾趣

- 孔子的“周游列国” (41)
- “左右之分”:右尊左卑 (42)
- 古代兵士的纸甲 (43)
- 唐朝人最怕说“虎” (44)
- “牛人”曾是一种职务 (44)
- 古代的“官”和“吏” (45)
- 明代的“大跃退” (46)
- 《资本论》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47)

知识窗

- 误用“乡愿” (32)
- 明清“大学士”为何称“中堂” (42)
- 何谓“文章” (48)
- 古代的计时和报时 王耀珍(49)
- “胜券”为何物 (51)
- “二十四史”指哪些史书 (52)
- 魏晋士人名字中何以多带“之”字 (52)
- 中国人过生日始于何时 (53)
- 圆公章的来历 (53)
- 世博会的由来 (54)

历代诗人咏长安

- 登科后 孟郊(56)

解字

- “七” (45)
- “十” (54)

名句欣赏

-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等 5 条 (51)

朱元璋曾想迁都西安

朱元璋(1328~1398年),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出身贫苦,少时入寺为僧,后参加红巾军起义反元。1368年正月,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

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明大将徐达攻占元奉元路,旋即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西安”的名称。九月,朱元璋置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中都时,曾对建都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据《明鉴》载:“帝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或以洛阳天下之中,汴梁为宋旧京;或又言北平(今北京)故元宫室,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说:“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宫室亦不无更作。建业(今江苏南京)长江天堑,龙盘虎踞,足以建国。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为中都,何如?”众臣同意朱元璋的分析,“皆称善”。这说明,西安曾是明初可供选择的建都地点之一,它之所以没被选中,主要是因为“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朱元璋不想“重劳其民”。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考虑到西安在大西北和全国的重要地位,特封其子朱棣为秦王,镇西安府。继而修造豪华壮丽的秦王府,开拓西安城垣,置西安都尉,加强对其



地的统治。十一年(1378年),新建的西安城垣竣工。十三年(1380年),建成鼓楼。十七年(1384年),又建成钟楼。这时,西安府已基本上改变了宋元以后颓废衰败的面貌,成为西北地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曾想迁都西安。还据《明鉴》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帝念天下形势在西北,欲迁都关中”。是年八月,特令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到西安“相宅”——审度地形,察看可以建筑宫殿之处。秦王朱棣经营西安多年,“闻帝欲迁都,有怨言”。朱元璋由是大怒,立即把秦王“召至京錮之”。直到十一月,朱标回归为秦王说情,朱元璋才把秦王放出,“始令归藩”。朱标还抵京师,“上陕西地图,遂病,病中犹上言经略建都事”。遗憾的是朱标一病就卧床不起,于次年四月过世,朱元璋欲迁都西安事遂不了了之。

第二轮志书体例模式倾向思考(下)

◎ 王 晖

六、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科学设置人物志

第二轮志书应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克服首轮志书见事不见人的弊端,加强对人物的记述,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但加强人物记述重点是以事系人,而不是变相地为生人立传。

(一)人物简介是变相为生人立传的根源。

由于人物传略与人物简介在形式和写法上没有明显的界限,人物简介不简,很大一部分人物简介篇幅比人物传还长,这样的人物简介就是变相为生人立传。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志书扩大收录范围,将20世纪70年代后的30多岁的人物都收入志书,这是非常不妥的。《辞海》、《大百科全书》都遵守史家法度,盖棺定论,不收录生人简介,具有史书性质的方志更应该遵守通史家风。中国地方志指导下发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曾严格规定:“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重大影响、有突出贡献、有代表性的在世人物,主要采用以事系人的方式记述;在人物简介、人物表(录)中需要反映的,要严格掌握收录标准,其原则由省一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确定。”现在,《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五章第二十条重申了“生不立传”这一古今通则,各级志办尤其是省级志办更应该加以重视,按照《意见》和《规定》及时确定人物简介的收录标准和记录要素,控制变相为生人立传的现象

蔓延。有的省已出台制止为生人立传的办法,例如《广东省地方志书审查验收办法》第十五条就是关于审查“人物符合生不立传的原则”的规定;河北省出台的《地方志书编纂质量标准》规定“不可用人物简介的方式变相为生人立传”。这些禁止为生人立传的硬性规定值得推崇。

(二)生人立传注定形象不完整。古代坚持生不立传,追求的就是盖棺定论,形象完整。现在为生人立传的理由说得再充分,所写的生人都是成绩卓著、基本定型的人物。这是典型的机械唯心主义观点。如中国科技大学创办少年班之初,媒体宣传得沸沸扬扬,将才入学的十一二岁孩子当作神童长篇累牍地报道;可是过了五六年,记者再次采访他们时,有的木讷无言,有的拒绝采访,毫无当年神童的风采,因此,后来少年班不再让媒体过早地去捧杀报道。人是可塑的,智力在变,精神更在变。现在功成名就,精神高尚,不等于未来永远辉煌。倘若将那些三四十岁有一点成就的人士立传入志,别说盖棺就变样了,尚未退休就变了质,志书如何去传世教化后人?还有不少当年光彩照人的劳模,在改革大潮中经不起风雨考验而不慎落水,以及官场上屡屡出现的“五九现象”,认为到了59不滥用权力就过期作废,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不胜枚举。像成克杰之流的高

官贪官是可以立传入志的,问题是在他们未走完人生道路之前立传,注定形象不完整,定性不准确。

(三)人物太少难以成志,可将人物传略移到人口志中。变相为生人立传还有一个奇怪的理论,认为不为生人立传,第二轮志书没有多少去世的人物可记,人物志就立不起来。这种说法有点荒诞不经。人物志不能独立成志,人物传少可以放到相近的类别中去,比如人口志即可系人物传。人口志怎么写?传统做法仅限于人口普查、人口构成、人口变动、姓氏民族、人口控制等;后来有所发展,增加了人口素质、婚姻家庭、人民生活;再后来有人呼吁要写人才状况,历史上出现多少状元,现代出现多少博士、教授。既然写到这里,笔者以为若将为数不多不能独立成志的杰出人物传略纳入其中,人口志岂不就更加完善了。

七、按《条例》和《规定》科学处理断限外材料

第二轮志书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断限以外材料处理很随意,不像首轮志书严格控制断限,不管什么时候出书,志书下限确立之后就是不动,限外材料一律删除。要么适时更改下限。这种做法是明确的,可以理解。第二轮志书的断限问题,普遍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直言之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一)《地方志工作条例》界定地方志包括方志与年鉴,那么,方志与年鉴的职能就应当合理分配。方志与年鉴的空间特征不可分,但时间特征能划分清楚,年鉴积累每年资料,方志合成20年的资料,20年年鉴成一志,那么,年鉴就成为记述志书断限以外现状资料的载体,志书也就没有必要下延断限。

(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严格控制

志书下延。《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五章第十六条规定:“时间界限明确,不随意突破志书的上限和下限,严格控制上溯或下延。”这是针对志书断限随意上溯和下延做出的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志书20年一修,各地志书都根据这一修志法规,设置了大体相近的第二轮志书断限,即1986~2005年。可是执行起来又很混乱,有的机械地套用改革开放30年的概念,硬是将上限调至1978年,下限延至2008年;有的志办急功近利,为争取早日出书,下限提至2000年、2002年,这就完全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于不顾了。按笔者理解,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下限太近难以客观记述。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距离搁笔太近的资料不一定真实,现实的事物未经历史的沉淀,一时难以看清本质,就会产生历史局限性。所谓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当代不是当年的概念,下限太近,有些不切合实际的计划和尚在动态发展着的事物,一时看不清本质面目,记入志书难以做到实事求是。让事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沉淀再记述,就能够保证志书的真实性,减少当代人修当代志的历史局限性。基于历史的观点,下限大可不必下延。第二,从现实的角度看,下限后的内容应当让位于年鉴。修志要为现实服务,但志书是传世之作,为现实服务的还有其他载体,如统计资料、地情手册和年鉴等。因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应该遵守《条例》和《规定》,控制下延,将近期的史实让位于年鉴。

(三)适当下延不一定要打入另册作附录或志余。第二轮志书大多采用附录形式,少量设立志余篇记述下限外的内容,形成志书大大小小的“赘疣”。志书叙事不立断限,故有的

事物超越上限不足为奇。如有的志书下限2002年,但又不忍心割爱下限的资料,于是将“2003~2008年的经济发展概况、要事纪略、县四大班子领导任职表”收入志书,但不放在相应的篇章中,而是因断限束缚,放到附录或新设志余篇中。本意是想为现任领导粉饰功绩,而收到的效果适得其反,因割断历史,现任领导和业绩被贬低了,不入正志的领导更迭表,也打入“冷宫”,另册附录或作志余。

前文所说,反对断限外太近的资料入志,主要是为防止看不清动态变化着的事物的本来面目,但不等于所有的限外资料都不用,对于机构成立、官员任职这类静态的事物,不需要经过历史沉淀和检验,恒定事物原则上可以遵守断限不记,也可以突破下限记入志书,但将新成立的机构,新任即现任领导人,断限外党委、人大、政协等重要会议的召开,特大工程竣工等放在附录或志余位置上就不恰当了,还应该顺理成章入相关篇章中,保证历史不致中断。方法上灵活处理一下,即在《凡例》中增添一笔,说明某些篇章断限下延至某某年。《北京志》就是这样灵活处理的,如《中关村科技园区志》,按照首轮志书的下限,中关村还在襁褓之中,难以独立成志。为了使《北京志》不失去科技园区这一亮点,于是大幅度地改写下限年限,该志“下限统一为2005年12月31日”,这与第二轮志书下限无异。这一改,使首轮《北京志》科技方面记述周延完善了。此举值得称道和借鉴。

八、约定俗成的专(分)志名称不应更改

专志的名称是志书的顶级标题,标题的拟订是志书篇目设计的首要环节,标题要拟得约定俗成,耳熟能详,不可随意更改,尤其不能超出现实,乱改一气。

(一)经济部类志不要赘述经济名称,如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经济是个大概念,作为这三篇的主语,前面加上农业、工业、商业,内涵多了,外延少了,概念就变小了。有的志稿在种植业章下设立农业经济效益节,这样局限性更明显。志书标题,不要有太多的修饰,直言约定俗成的事业、行业名称即可。

(二)农工商不必改称一产、二产、三产志。第二轮志书体例设计出现套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与代码》的分类方法,将经济分类上的三大产业划分推到志书门类标题的前台。这些理论和方法志书可以灵活借鉴与运用,笔者不赞成的是不结合社会分工的现实,单纯地讲科学分类。例如农、工、商,《史记》都有记载,是千年形成的行业专用特指名称,尽管前些年政府机构改革,但农业始终是稳定的,工业、商业曾换了新的名词,如管工业的部门撤销归并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管商业的撤并到经贸部(委),可改来改去,后来还是恢复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厅)、商务部(厅),事实证明,农工商三大行业名称不可更改。有的志书直接将经济部类划分为第一产业志、第二产业志、第三产业志,实在是不妥的。

综上所述,新志出现的模式基本是第二轮修志在创新的思维指导下所产生的。创新本应支持,但不切合实际的创新还是不能盲从。体例创新不是说变就变的,上下两千年持续编纂的二十四史,体例不外乎是纪、传、志、表四大体裁。志书体例创新难,要鼓励创新,但需要正确的理念,那就是追求内容上的创新,在内容决定形式、形式符合志体、志体服务内容、内容贴近现实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稳妥地创新。

(全文完)

对年鉴功能的基本定位,是年鉴理论研究的基础课题。我认为,年鉴最基本的功能不外乎两个,一是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二是年鉴的存史功能。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得到年鉴界普遍认同,但年鉴的存史功能却没有得到业界的充分肯定。年鉴编纂者应该转变观念,在更好地发挥年鉴为现实服务功能的同时,研究和探索年鉴本身具有的存史功能,发挥其他媒介所不具有的存史功能优势,才能使年鉴的存史和服务现实两大功能真正得到有效发挥。那么,如何提高年鉴的存史功能呢,我想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年鉴编纂人员的存史意识。年鉴存史意识的培养和强化,需要在长期的年鉴编纂过程中学习、总结和积累,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这里,首先应该弄清楚最基本的概念问题,既要认识到年鉴的存史价值,又要认识到“年鉴是工具书,绝不是史书”。这是因为:(1)两者的编纂目的不同。年鉴是客观记载一个地区上年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和特事,为读者提供查阅之便。史书则是通过对一个地区某个历史时期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记述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2)两者的记载时限不同。年鉴记载的是一个地区上年度发生的事,史书记载的是一个地区数十年或数百年内发生的事。(3)两者的记述方法不同。年鉴是充分利用占有的资料,提供有用的信息,通过选题和资料的取舍,可以体现观点,不加评论。史书是按一定的历史观点选择并组织材

如何提高年鉴的存史功能

◎ 崔义萍

料,加以评述,得出结论。总之,年鉴的资料仅仅具有史料价值,可以作为编史修志的资料来源。

所以,各级年鉴编纂人员应从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年鉴编纂的地位和作用,应准确地把握每年的重点、热点、亮点、难点等存史价值较大的内容,并在年鉴中实事求是地给予反映。要树立严谨、周密的工作作风,遵循年鉴选材全、新、深、实、特的原则,对地区重大事件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亲自调查研究,采集资料,整理编写成有深度、存史价值较大的稿件。对一些政府机关的例行会议、日常活动、常规性工作等一系列“内向型”资料尽量不记或少记,这些信息属于“死条”或“半死条”,不仅检索率低,而且存史价值也不大。同时,还要不断地加强历史学的学习,在学习中培养编纂年鉴的存

史意识,努力提高编纂水平。力求实现年鉴编纂资料性、整体性、全面性、权威性、实用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编纂出的年鉴才能全面反映地区各领域发展成就,揭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探索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为地方历史的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原始史料。

二是年鉴编纂要以“实录”为原则。“实录”即真实地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夸张,不隐瞒。诚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实录”不仅是撰史、修志工作者必备的素质,更是年鉴编纂者必备的素质。首先,要求年鉴选题必须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忠实地记录历史,不应因为某种需要或凭主观好

恶刻意对存在的问题或负面情况作隐讳处理,采取回避或淡化处理的态度。如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使我国结束了实行 30 多年的收容制度,《广州年鉴》就在大事记及“今日广州”的彩色图片专辑中专门记录了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被评论为“官方文件第一次展露了负面影响”。其次,要确保年鉴内容的真实、数据的准确可靠。在编辑过程中,严格把关,认真核校,对有疑问的数据资料,反复核对,多方求证,在强调保持历史本来面貌的同时,努力做到内容真实、概念准确、数据可靠,使年鉴真正具有权威性。第三,“实录”并不是资料的简单摆放和堆砌,要在深层次和广泛度上下功夫,只有如此,才能使年鉴更加鲜活、生动,便于更好地施惠于当代与后世,发挥其最大的存史价值。总之,存史,就是要保存真实的历史,如果史实不准,不仅存史没有意义,而且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可以说,所用资料的准确性是年鉴存史的根本所在。

三是保持资料的连续性、可比性。年鉴作为地情书,必然收录地方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经济运行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这些情况有些是年度性的,有些是时期性的,这就需要在保持资料完整性的同时,还要注意连续性和可比性。如记载某些行业的发展状况时,有些内容虽然相同但还必须每年设置,基本数据也要保持连续稳定;还有的事件是跨年度甚至几年才能完成的,这就需要每年在记述相应的事件时反映其后续情况,以保持事件的完整性。同时,还应收录历史延伸资料,不仅使读者能准确地看到事件的全貌,还便于通过比较分析,把握事态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如用本年度的数据与 1949、1978、2000、2005、2010 等特殊年份的数据进行对比,还可以设立“十五年纵览”、“改革开放 30 年成就”、“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等栏目,着力发掘保存重大历史阶段资

料,使年鉴更加全面、真实、深刻地反映年度情况,并达到立体化、连续性的要求。如果年鉴的资料不具有连续性、可比性以及完整性,不仅会给读者带来材料使用的困难,也会留下历史的缺憾。

四是加强人文内容记述。年鉴要全面记载地情,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人文内容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渗透到自然、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贯穿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人文内容最能深刻地、本质地反映一地的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与具体风貌,并对区域发展起到能动的推动作用。如果只强调以经济部类为重点而忽视人文内容的记述,人文方面的内容很少,那就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客观面貌。因此,我们在编纂工作中,要加强人文内容的记述,尤其要加强人的活动记述。人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最具创造性、最生动活泼、最可宝贵的因素。没有人的活动,就不会形成社会;没有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历史。只有重视人文内容的记述,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我们在年鉴编纂实践中,还要正确处理好年鉴为现实服务功能和存史功能的关系,不能把存史价值和为现实服务对立起来。纯粹为了积累资料或提高年鉴的存史功能而编年鉴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是不对的。同样,过多地关注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而对年鉴的存史功能没有认识或认识不清,也是不正确的。从一定意义上看,“年鉴的历史性总是寓于现实之中,它只有真实地记录现实,才能深刻地反映历史”(许家康:《提高专业年鉴编纂质量的几点设想》,《年鉴信息与研究》2003 年第 5 期)。年鉴越是为现实服务得好,有力地发挥了资料的咨询、参考、借鉴价值,其存史价值就越高。



亢心栽

亢心栽(1906~1978),又名亢维恪,化名王维洽。陕西蒲城人。蒲城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校学生会、渭北学生联合会领导职务,1923年发起组织青年同志共进社,后又组成渭北青年社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4年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底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春亢考入北京中俄大学,后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毛泽东任所长),任干事会干事,结业后被派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主任。时值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亢去三原、泾阳发动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武装,配合西安反围城斗争。西安解围后,亢在中共西安地方执委会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和军事政治队任教育长,还协同长安县成立农协组织。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亢任区执委会执行委员、农委书记,筹建陕西农协及编辑农民通俗刊物《耕牛》。是年6月省农协正式成立,亢任省农协常委兼宣传部长,并驻会主持工

作。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亢任省委委员,不久到泾阳、三原、渭南、赤水、华阴等地组织和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粮斗争。1928年2月,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负责渭华起义的筹备工作,由于意见分歧,被撤去县委书记职务,不久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亢的妻子徐九龄又被国民党新军阀杀害,其情绪日渐消沉,故脱离了中共组织,在岐山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和凤翔等地中学教书。1930年11月亢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1934年初在杨虎城部任秘书,后在省教育厅任督学兼编辑,1936年在西安高级中学教书。1937年5月,杨虎城辞职出国考察,亢以秘书身份随行。同年11月底亢回国后任西安高级中学教务主任,1939年任校长,1940年后任省立政治学院教授,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总务长、训导长及省教育厅秘书、科长等职。其间,亢先后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并担任三青团西京市分团部干事兼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

1946年2月,亢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西安市组织部长,是年夏任北平华北文法学院教授兼秘书主任、北平民盟支部委员。

北平解放后,亢赴延安在延安大学任教,与杨明轩、李敷仁等恢复民盟西北总支部,并任秘书长。西安解放后,亢协助军管会接管西北大学,任该校校务委员、教授兼外语系主任。1950年后,亢历任西安市第二、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市政协副主席,第三至六届市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工会西安市委员会副主席,还担任民盟省市委会的领导工作。

1978年8月在西安病逝。



大秦寺出身之争

◎ 任 升

大秦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迄今已有1360年历史。该寺位于西安市西南70公里处的周至县楼观镇塔峪村南200米的山麓，向东是道教圣地楼观台，向西是传世作品《长恨歌》诞生地仙游寺，向南是财神赵公明故里。历史上许多文人骚客来到大秦寺，唐有卢纶，宋有苏轼、苏辙，金有杨云异，明有何景明，他们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由于战争和灾害的影响，现今的大秦寺仅存大秦寺塔，为七层八棱楼阁式空心砖塔，高度为40.9米。大秦寺塔是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1957年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秦寺保护纳入“中国丝绸之路保护项目”，2001年10月，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将

大秦寺塔及大秦寺列入《世界建筑遗产名录》。2007年6月，在乌鲁木齐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我国6个省区包括大秦寺在内的48处文物点列入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但就在官方申遗之际，突然有人提出异议：大秦寺是佛教遗迹，不是景教遗迹，给申遗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认为大秦寺是佛教遗迹有以下几点：

1、1933年，北京大学向达教授考察周至大秦寺后著《周至大秦寺略记》中明确写到：大秦寺始建于大唐贞观年间，为皇家佛教寺院。

2、大秦寺历代宗师均为佛教僧人，有佛教墓碑为证。

3、大秦寺塔原名“镇仙宝塔”，不是“大秦

●史料钩沉●

寺塔”。

4、中国景教研究某权威人士在其著作中提到：大秦寺之所以被定性为景教寺院，唯一根据是其名“大秦寺”，其他一切文献材料均不表明该寺院是一所地地道道的景教寺院。

5、现在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中国现存唯一景教痕迹，碑林记载该碑出土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长安义宁坊，而非周至大秦寺。

那么，大秦寺到底是佛教遗迹还是景教遗迹？要想弄明白这件事，首先要了解景教的发展史。

景教始创人聂斯托利(Nestorius, 380~451年)生于叙利亚，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的神性，因此反对将她作为神灵膜拜。史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古代东罗马帝国(中国称之为大秦国)景教(基督教早期派别)传教士阿罗本经波斯(今伊朗)来中国传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视，允许他在京城建寺传教。唐至德六年(765年)唐肃宗李亨允许传教士在洛阳、周至等地建立景教寺院。景教在长安兴盛起来，但信奉者多为非汉族民众，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在传教士景净主持下，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称景教碑，该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景教、祆教和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845年，唐武宗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被佛教界称为“会昌法难”，殃及景教，景教几乎消失。元朝建立后，不少色目人来到中国，使景教在中国又重新兴起。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扶持儒、释、道三教，景教又遭打击，十六世纪中后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景教从中国完全绝迹。

经过我实地考察，查阅资料，认为大秦寺是佛教遗迹的观点站不住脚，理由如下：

1、历史上大秦寺是多元文化的演化过程。从景教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在1300年间，由于封建统治者关于宗教政策的原因，大秦寺经历了兴盛景教、道教、佛教、儒教等。景教在中国吸收了外教特别是佛教概念。他们把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大秦寺的历史显然是多元文化的演化过程。

2、关于向达教授的观点。向达(1900~1966)，字觉明，土家族。湖南溆浦人，著名的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1924年毕



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他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论述于阗、龟兹和昭武九姓各国居住中国的西域人，阐明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阿罗本当是罗马东徼之人，其他僧人也是中亚人。在其《周至大秦寺略记》一文中提到大秦寺古钟铸文，并称自己“当时匆匆，无暇细考，至今思之，犹有余憾”。从题目可以看出，向达教授认为大秦寺在周至。前述认为大秦寺是佛教遗迹的观点中，第3点和第4点关于“大秦寺塔”的描述明显矛盾。由此可以看出，大秦寺是古名，并不是因为申遗而临时改名。用向达教授作为反对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3、关于《景教碑》的出土地之争。《景教碑》、《罗赛塔双语碑》、《西伯来文碑》和《授时碑》被称为世界考古史4大名碑，《景教碑》位列首位。《景教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该碑内记述了景教入华的一段秘史和传教事迹，歌颂了唐太宗等六朝皇帝对该教的礼遇和崇信，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数语，可能是既取“基督”的谐音，又取光明辉煌的含义。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通高40.9米，楷书碑文，

共1780多字，叙利亚文89行，景净撰文，吕秀岩书丹。明天启三年(1623年)《景教碑》出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关于《景教碑》的出土地争论不休，反对方认为，认为大秦寺是景教遗迹，很大原因是因为《景教碑》的出土，而《景教碑》并非出土于周至。事实上，在当时，外国传教士争相来周至拓片，并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传教士的拓片来自大秦寺是不争的事实，这从一些来过大秦寺的国外历史学家的书籍、家书、日记等文献资料中均可查阅到。

4、大秦寺塔内遗存有景教遗迹。大秦寺塔内遗存有景教泥塑，1999年加固大秦寺塔时，在塔顶可以看到，塔尖的形状、结构和一般佛塔明显不同，在古塔顶的砖上，刻有叙利亚文字，大秦寺塔一层和二层是完全“隔离”的，只有从塔的外面爬上二层，才能在塔内顺着楼梯拾级而上，塔的一层顶部是半圆形的，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发现的唐代泥塑像，专家确认就是耶稣和圣母像，而不是佛像。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景教、佛教、道教、儒教都曾入住过大秦寺，大秦寺是多元文化的融合，简单地把大秦寺归类到某一教的遗迹是不对的。

(上接第43页)如遇水雨浸湿，锐箭难透。”陈氏所说的“无性极柔之纸”不知是何纸，但可看出它极柔韧，叠厚三四寸后再用铁钉固定。

2004年11月，贵州省凤冈县双山乡田家寨村的青杠坝发现了一件清代咸、同年间的纸甲实物，可见纸甲直到晚清依然在战争中

使用。

近代军事战争，动用了枪炮、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武器，在这些杀伤力极大的武器面前，纸甲显得不堪一击，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中国人的百年世博梦

早在 1910 年,上海小说家陆士谔,就曾在他的小说《新中国》里虚构了一百年后在上海浦东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具体情形。而梁启超、郑观应等有识之士也都曾提出举办世博会的想法,不过在当时国力衰微的中国,他们的主张只能是梦境中的幻想而已。今天,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让中国人百年前的“预言”神奇地应验了!

在上海城区的西南方向,有个叫朱家角的古镇。据史书记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已烟火千家,经济发达,人才辈出,后来成为近代著名小说作家的陆士谔就是朱家角人。

1878 年,清光绪四年,陆士谔出生在朱家角一个读书人家庭,他从小爱读稗官野史,14

岁那年,父亲去世后的陆士谔到上海城里行医谋生。后来他弃医从文,最终成为市民热爱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1910 年,32 岁的陆士谔完成了一部充满幻想的小说《新中国》,全书共分 12 回,以一个梦贯穿,虚构了 100 年后的上海。主人公“陆云翔”其实就是作者本人。陆士谔之孙陆贞雄说,他的祖父在这本小说里写道:“在我们中国上海浦东要召开一个万国博览会,要开这样一个会,中外游客都要到我们上海来。”

在小说《新中国》里,一觉醒来的陆云翔与妻子李友琴游历上海,他惊讶地发现,租界的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昔日趾高气扬的洋人

见了中国人彬彬有礼，而街头的新生事物则更多，以往经常碰撞行人的电车也改为地下行驶，据说这是学习欧美的结果。“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更让小说主人公陆云翔惊讶的是：“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妻子告诉他，这是20年前，在浦东开博览会的时候，为了方便往来，才建造这大桥的。因为开了博览会，“现在浦东这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小说结尾，陆云翔被门槛绊了一跤，就此跌醒，方知是梦幻一场。

在晚清，幻想小说大量出现，在一个国运衰微、时局动荡的时代，知识分子热衷于构筑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世界，陆士谔并不是第一人。

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于1902年，比陆士谔的《新中国》早问世了8年。小说共有5回，从60年后的公元1962年正月初一上海举行博览会写起，作者的想象是这样的：“那时我国国民决议，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在这个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年轻文人幻想中，中国已经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文成为世界语言，20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新中国未来记》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追求民主，希望国家富强的一个理想。

在梁启超之后，晚清上海的另一位小说家吴趼人又出版了小说《新石头记》，他以穿梭时空的表现手法，再次虚构了在上海举办的一次世界博览会。

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幻想作品中，期望自己的祖国能举办一次世界博览会，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将博览会的举办地点安排在上海，甚至具体到当时还是一片荒凉的浦东。

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问世的那一年是1910年，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时间相差整整一百年。

唐德顺老人今年75岁，退休前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高级工程师。平时一有空儿，他总是喜欢到东台路的古玩市场去走走。

唐德顺1954年大学毕业，他对集邮非常感兴趣，平日里，纪念章、纪念币也是他搜集的重点。由于懂得外文，他对外国邮票情有独钟，正是通过这些邮票，他知道了世界博览会。为了更多地了解世博会的内容，唐德顺进而又搜集起了历次世博会的奖章、纪念章，并将世博题材确定为自己主要的收藏方向。

这些纪念章都是当年由举办国政府特别发行的，其中最珍贵的当属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世博会纪念章，细致精美的图案仍然清晰可辨。

100多年的历史实在不能说短暂，我们还无法说清这枚纪念章以什么样的方式从伦敦来到上海，也无法还原它是经过了怎样的途径到了一个中国人的手中。我们能够准确表达的是，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兵荒马乱、风霜雨雪后，这枚有着第一次世博会标志性建筑

●史料钩沉●

“水晶宫”图案的纪念章,完好如初地保存在一个上海市民手中,承载着一段珍贵的记忆。

1851年英国工业化程度已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英国希望通过一次博览会这样一种仪式性的活动,把它的世界经济领先的地位确立下来。

博览会皇家委员会很快就在伦敦成立,他们举办了征集设计方案的竞赛,总共收到大约250份方案,但其中很多方案都采用了传统的建筑形式,也就是那种永久性建筑的设计方案,直到设计比赛的截止日期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设计。

就在博览会皇家委员会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名叫约瑟夫·帕克斯顿的园艺师毛遂自荐,抛出了自己的创意。

1837年,一位探险家在英属圭亚那发现了美丽的王莲,他把种子带回英国,交给园艺师帕克斯顿种植。3个月后,王莲开了花,叶子越长越大,园艺师把自己的小女儿抱在其中一片叶子上,叶子竟然完好无损。如果把王莲的叶子翻过来看的话,会发现它们具有这样的筋脉,用来帮助支撑它们所承受的所有重量。帕克斯顿由此触发了创作灵感,并结合自己设计温室的经验,完成了水晶宫展馆的设计。

1851年5月1日上午9时,50万多人聚集在恢宏壮观的“水晶宫”四周。12时的钟声敲响,维多利亚女王骄傲地宣布: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开幕。

博览会结束后不久,英国著名画家亨利·赛伦斯用他的画笔重现了当时的盛况。维多利亚女王居中侧立,在她左右两侧是前来出

席博览会的各国宾客。引起我们格外注意的是,在这样的盛典上,还出现了一个身着大清国朝服的中国人身影。

经过考证发现,这个中国人叫希生,他是当时停泊在泰晤士河畔一艘船上的中国人,这艘船叫耆英号。那天他刚好路过,就在这里下船,那天刚好是开幕式,他就来到水晶宫跟英女王敬个礼。他进来的时候,因为满洲王朝行礼的方式跟欧洲人行礼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而且他身上的打扮一来看起来很华丽,二来也看出来这个人很不一样。

在这次博览会上,近两万个参展商所提供的十万多件展品,在水晶宫内呈现出一片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的美妙图景。在众多的展品中,最受欢迎的是各种机器,所有的机器都轰隆轰隆的在那开着,展示出非常巨大的力量。许多参观者在这里看到了他们平时绝无可能看到的商品,看到这些神奇的机器承担以往只能靠人工、而无法借助机械的帮助来完成的工作。

参观游览这届博览会的有600多万人,几乎是当时伦敦人口的3倍。历史上,除了战争和迁徙,人类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会聚。可以这样说,1851年的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标志着人类大规模文明交流新形式的出现,同时,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也进一步得以彰显。1851年世博会出人意料的成功,它帮助塑造了英国的形象,也让英国人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凡的信心和自豪。

1851年春天,在上海的广东商人徐荣村偶然获悉了英国即将举办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的消息,他立即将自己所经营的“荣记湖

丝”打上 12 包,装船运往英国,湖丝在伦敦世博会上获了金奖,也为中国在世博会的历史破题。但这只是民间行为,清政府首次参加世博会还要到 1904 年。

“荣记湖丝”参展伦敦世博会 8 年后,洋行又来了一位年轻人,和徐荣村一样,他也是广东香山人,就是后来成为维新派代表人物的郑观应。1894 年春,郑观应的著作《盛世危言》出版,据说光绪皇帝读了大为赏识,诏命总理衙门特印 2000 部,分发京都大臣阅读。几年之内,这本著作被翻印 20 多次,共 10 余万册,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其中就包括举办世界博览会。书中《赛会》一篇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认为:“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

始。”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实例。100 多年前,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一个国家展示自己昌盛国力的骄傲行动,而在那时的中国,它还只能是萦绕在郑观应等仁人志士心头的一个梦想。

改革开放为新中国参与世博事业提供了契机。继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2001 年 5 月,中国正式提出主办 2010 年世博会的申请,江泽民同志在会见国际展览局考察团时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举办一次最成功、最精彩、最难忘的世博会。2002 年 12 月 3 日,中国上海获得 2010 年世博会主办权。这是世界对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中国的信任,也是走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中国对世界的奉献。

2010 年,在中国上海搭建起了一座世博会的金桥,它融合空间阻隔,连接起历史与未来。





中国的贵族精神 何以逐渐消亡

当下有相当一些人很赞赏西方人的骑士精神、绅士风度,做事有原则讲诚信。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也曾盛行贵族精神,那么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逐渐消亡的?

宋襄公的选择体现贵族精神

宋襄公的故事最早记载在《左传》中,说的是宋国跟楚国要打仗,他们选择在泓水的一边作为阵地。宋国军队很早就开到阵地,排好了队列,楚国准备从另一边渡过泓水来进行交战。就在楚国渡河的过程中,宋国有一个军官献计说,给敌人来一个突然袭击。没想到宋襄公却说,这怎么能行呢!君子在战争中是

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人、头发已经斑白的人,敌人处于险境的时候,不能落井下石,现在敌人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绝对不能突然袭击。于是就非常“君子”的等着楚军全部过了河之后,宋军才展开攻击。结果由于寡不敌众,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在战争中受伤死去。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宋襄公这人太蠢了。但是,这个故事能反映宋襄公身上的贵族精神。

如果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理解宋襄公的这种选择。春秋时候,因为双方主体都是贵族,那时候连当兵的都是贵族,所以大家打仗的原则是点到为止,

给足对方面子，并不以把对方赶尽杀绝为目的。一旦分出胜负马上鸣金收兵。

宋襄公是殷朝的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的贵族教育，所以对他来讲。在战争中取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胜得合理，胜得光明正大。

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条就是荣誉。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他们认为自己的血液是高贵的，绝不能用下三烂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因为重视荣誉，所以贵族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敢于承担，他们身上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承担精神。

承担和贵族精神挂钩，对今天的国人来说似乎难以理解。因为现在中国人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其实真正的贵族精神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贵族是社会的上流，这一方面让他们产生了荣誉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在享受种种特权的同时，也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或者是为自己的君主，不惜献出生命。

在春秋的时候，郑国虢地曾召开过一次停战大会，各国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开会过程中，有消息传来说鲁国出兵攻打莒国，这让与会代表非常生气，决定要杀掉鲁国派驻大会的代表叔孙豹来发泄大伙心中的怒火。其中有一个晋国的代表乐桓子与叔孙豹是朋友，想救他。但叔孙豹说，我们鲁国派我来参加大

会，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现在大家对鲁国有怨气，想通过杀掉我的方式来发泄怨气，那么我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晋国国君就向楚国国王求情，咱们两个就饶他一死吧。因为他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咱们如果饶他一死，也可以劝勉那些忠心为国的人。这个故事很鲜明地体现出先秦贵族身上的那种勇于承担的精神。

秦统一六国让贵族精神消亡

在春秋战国时期，忠义耿直的故事特别多，比如说有一个叫“季札挂剑”的故事，说的是吴国有一个公子叫季札，国王派他出使晋国。途中路过徐国，在与徐国国君聊天过程中，季札注意到，徐国的国君一直在看他腰间挂的这把宝剑。季札知道他喜欢这把剑，但因为君子不夺人之美，所以没好意思直接开口要。季札读懂了他的心思，想把这把剑赠送给这位徐国国君，但是，当时的外交使者，身上必须佩剑。他想，等我出使完了之后，回国途经徐国时，再把剑送给徐国君，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于是在徐国呆了几天，就继续出发去到晋国。等他在晋国完成了外交使命，回国的路上经过徐国时，他兴冲冲地想把宝剑送给徐国君。却听说徐国君突然得了急病死了。季札非常悲痛，就找到了国君的继任者，说，先君活着的时候跟我非常好，我曾经把这个宝剑送给他，但是他不幸去世了，现在我把这个宝剑送给您，以表达我的心意吧。但是这位继任者说，我们的国君活着的时候没跟我交代过这件事情，所以您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收下。季札一听，说，那么我去祭拜一下

您的先君。于是就来到徐国君的墓前,恭恭敬敬地行礼默哀,之后,季札从腰间解下宝剑挂在了徐国君墓边的树上,然后扬长离去。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那时候贵族的气质,雍容、高贵、高雅、从容。可是让人遗憾的是。到了后来,先秦时代的这种贵族精神,随着后来皇权势力的不断膨胀而日渐衰减。

为什么中国贵族的这种精神失落得会这么早呢?这是因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当中,把原来国家的贵族基本上都给杀掉了,那些没有被杀的,或迁徙或流放。因为秦国的专制制度发展得特别早,所以秦国的贵族的特权早已被取消,与平民一样,都是皇帝的奴仆。因此,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中国的贵族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消亡了。之后虽然历朝历代都会分封一些王、公、侯、伯,但是他们的贵族身份和秦始皇之前的贵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之前的这些贵族有封地,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像土皇帝一样自己说了算,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之后历朝历代的这些贵族,只享受高爵重禄,没有实际统治老百姓的权利,不允许过多地干涉政治。所以说,贵族阶级到秦始皇就基本告一段落。没有了贵族这个阶级,贵族的精神文化也就渐渐消亡。

贵族精神的消失,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制度也随之消失,天生的世袭思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民的进取精神,竞争意识。另一方面,贵族阶层毕竟是培养贵族文化的最好的土壤,平民阶层无法提供这样一个生长环境,所以,贵族文化的那种优雅

和精致,自然就丧失了光彩。

平民皇帝视贵族精神为懦弱

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在刘邦之前所有国王和皇帝都出身于贵族,刘邦之后,许多的开国皇帝都出身于平民,甚至大部分是出身于平民中的那种流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现象。有学者研究过,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除了北魏、隋唐这些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统的皇帝之外,其他汉族的开国皇帝大都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比如,蜀汉的开国皇帝刘备,他是织席小贩;南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卖鞋为业;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年轻时穷困潦倒;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可用“赤贫”两个字来形容。

在贵族社会中,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战争中,彼此都会留有余地,行事相对比较温和。在秦始皇之后,中国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所有的政治家都相信,在政治斗争中一定要心狠手辣,斩尽杀绝,不能给对方留一点翻盘的机会。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之后,一方面赶紧跑到李渊面前,向他承认错误,说我把我的兄弟杀了,我罪大恶极;另一方面却偷偷地派自己的手下,到他哥哥和弟弟的府中,把他哥哥和弟弟的所有孩子,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全都杀光。

因此,后来中国的历代皇帝,在他们的精神层面上,不要说离贵族精神遥不可及,连基本的人性都达不到,以至于后来有了这样一个标准:谁在政治斗争中心慈手软,谁就是懦弱,懦弱是可耻的。当然没有人会去懦弱,于是继续秉持那种没有人性的政治斗争。



岁月留痕

◎ 田周民

庚寅年正月十四，我们高中时的同学相聚在县城金龙酒店，还把当年的班主任邵步越老师邀来，举行了一场热烈又庄重的师生联谊会。受老师和同学们委托，我竟被推举上了联谊会的主持席，真是幸莫大焉！

举杯先问寻常事，开口尽是洒脱人。我们这群昔日的黉门学子，时属高七四级三班，相识于38年前的户县第八中学，两年后学业期满，又于此相别。自校门口挥手从兹一去，同学们脚下的路便各不相同，仅五到十年的时间，人生的长跑就拉开了距离。第一波冲刺的进了军营，显得来势凶猛又轰轰烈烈，一时间红五星、绿军装耀得人眼花缭乱，也让人羡慕不已。这一波同学英勇而果敢，闪电式跳出“农门”扛枪戍边，率先成了最可爱的人，虽然后来陆续解甲归田，另栖高枝，再铸辉煌，那却是后话。第二波提速的是“高考者”的发狠，

五六年间几乎有过半的同学跃过那惊心动魄又颇具吸引力的高考“红线”，迈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这一波同学可喜亦可悲，多学了一点文化知识，能够建树于国家，这自然是可喜可歌的一面，然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所以在尽孝方面就极是无奈地留下了许多遗憾，这自然是悲苦又难言的一面了。第三波有志者便是那效法孔夫子，做了“传道授业解惑者”的一类，他们亦学亦教两不误，又一次十年面壁苦修行，在教师队伍的熔炉里终成正果。这一波同学可畏又可敬，可畏他们横空出世，初生之犊不怕虎，一拥而上竟然把我们的老师挤下教坛，自领了时代风骚；可敬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类的灵魂一代一代总需造就方能成其为人，而他们便不厌其烦，甘愿去做了造就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且表现不错，仅是中、小学的校长就出了好几位。其实最有毅力

的一波,还要数既没有盲目随波逐流,也没有在红尘千丈中迷失了人生方向的同学,他们或因家庭条件所限制,或为别的其他原因所不许,于是便毅然决然以家乡大地为母怀,心平气和把自己定位在耕作尽孝的准星上,一步一个脚印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负重而行。当然也还有为生计奔波的艰辛者,虽然为数很少,却是我们牵念最多的口中常客,记得这些年来,经济情况好的同学慷慨解囊于生活困难同学的义举已不鲜见。尽管社会的分工为我们每人确定了扮演的角色,城乡、体脑间的残酷现实也拉开了生活差距,使我们这一班同学人到中年,就有了辉煌与平淡之分。可是,谁也没有计较。辉煌的,并未因为辉煌了而沾沾自喜、趾高气扬;平淡的,也并非因为平淡无奇而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是各在自己的天地间默默耕耘着、生活着。

庆幸岁月早已褪去了我们身上的青涩,可叹光阴却又为我们涂上了太多的沧桑。当时光老人将我们推入不惑之年的大门,再牵引到知天命之年殿堂的时候,我们才恍然顿悟老师的崇高和伟大来,所以那天的活动就特意安排了一个“谢师仪式”。说句心里话,对于老师感恩之心的起跳当在师生分别不久的时候,其情感的表达自然就选择了师生联谊的方式。记得一九九四年腊月,有热心同学就组织过一次师生聚会。可那时候,我们还处在三十七八岁的年龄上,家庭、社会的重负才扛上肩不久,大家虽有美好的再聚愿望,但却缺乏喘息的时间。所以那次一别,眨眼又过去了十六年。这十六年里,可以说成功与失败相伴

了我们一路,不幸与万幸也相随了我们半生。就如这一次相聚,虽分头通知了所有的同学,可有四位我们却无法去联系,而且永远也联系不到了。岁月无常,谁料昔日的同学少年一不留意,竟做了黄泉路上的匆匆行者!所以联谊会上,我们在场同学全体起立,为英年不幸而逝的王权利、曹松岭、赵润卿、姜天民同学默哀了三分钟!

逝者如斯,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还活着的,我们应该还原回自己的笑脸,正视现实。因为,今天的天空需要我们来撑起,明天的朝阳也等待着我们去迎接。因此,瞬间的凝重之后,我们以另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一番峰回路转,忽然别开了生面。也正是这一柳暗花明的转机,师生间的谈兴竟让我的思绪渐渐飘忽了起来,而且一杯美酒下肚,中学时代的情景便波澜般由心海深处澎湃而出,更与杯中酒香一起弥漫在眼前……

我的中学时代在户县农村度过,正是“文革”时期,全不像现在都市红尘里的孩子,不仅饱受考试的威胁,不得亲近草木鱼虫,更不得纵情于山川溪流的乐趣。那时尽管天下熙攘不宁,于我们孩子来说却多了“热闹”的场景,别看贫于物质,却富于自然,裕于时光,所以每一想到我们的中学岁月,还是心有感念的。可是一九七二年底,我有幸参加了断而又续的中考并由此踏进了高中的门槛,从此对生活的记忆也就多了一些别样滋味。

我那时考取的高中在祖庵古镇上,却是一所新建学校,许多校舍尚在基建之中,绿荫花卉奇少本就使校园缺乏了幽静感;设施的

简陋更是让教室、饭堂、宿舍也要兼得其用。尤其在物质匮乏的岁月，好多同学甚至连一月三元五角的灶费也交不起，近处的以家为济还好说，远处的就一周背两次馍到学校搭一月五角的开水灶。最有意思的是起灶同学一日三餐去领饭，值日的同学每到饭时，须抬一个硕大的铁桶再拎一个硕大的竹篮和菜盆把全班的饭菜打回来进行再分配，所以管伙食的那个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勺子在手，权重如山。可以为亲者多予，也可以向疏者少给，欲多予，勺起勺落如同闪电，盛的饭就多一些。想少给，就放慢速度，手再稍抖一下，盛到碗里的饭自然就少了一些。久而久之，这个“把戏”便被戳穿，先是提意见发牢骚，继而就争执指责甩勺子，最后竟然闹腾到老师那里。如何裁判，还是老师有法，干脆一人一周让轮流来“执政”。就这样，人人都成了勺子的主宰者，人人又都遭到了在野者的弹劾，好在“执政”时间甚短，否则被“推翻”下台也绝非没有可能。搭开水灶的同学无“分饭不公”的烦恼，但生活的艰辛却更加一筹。那时绝无纯麦面的馍可背，最好也就是麦面与包谷面的“两掺子”。差一些的就纯粹是包谷面发糕。冬天还好一些，饭时掰开来用开水一泡，再加上自带的盐来调匀，一顿饭也就勉强饱了肚皮，可天热时，馍就极易发霉，尤其是发糕星期天下午背来，周二早晨就拉丝发黏，到了周三简直就是长丝加上绿霉彻底变了质，可不吃又怎么行呢？同学们只好把这样的食物掰到碗中先用开水烫一遍，把水算掉，再浇第二次开水时才放盐去吃。就这，不少同学周三中午那顿已是寅吃卯粮，等不得半下午就

饿得眼冒金星，直不起腰来，得请假赶回家去“饱”吃一顿再把下半周的馍背来。如此往复，一个学期也就过去了。

教室的功能，颇有意思。在四面透光又透风的教室里上课这是谁也不觉得苦的事情，因为那时，来自农村的学生谁也没见过更好的学校是什么样，没有对比也就没有鉴别，所以我们对自已的教室很有感情，尤其是高七四级三个班的教室自西往东依次排列，我们三班就在东头，紧临围墙又远离行政区，不仅可以逃避老师们随时监督的目光，东墙下还可以冬晒太阳夏乘凉，绝对一个课余时间的交流中心。下课铃一响，那里便是学子们谈天说地的乐土。由于学校没有饭堂，一日三餐，教室又作了我们的“小餐厅”，除了排队打饭时会弄得讲台前如抢购场的喧嚣与拥塞之外，一旦吃起饭来各就各位，反而是秩序井然。桌上的食物虽多焦涩寡味，却不乏欢乐的气氛，时隔了三十六年，往日那其乐融融的场景仍犹在目。

最难忘是晚自习后的住宿，近处的同学自然是回家而去，远路同学要留宿，就只能寄希望于教室。每晚下自习的钟声一响，喧嚣的呼应声、桌凳的碰撞声随之大作，那一阵抢占桌凳成了留宿同学的本能反应，身强力壮、行动敏捷者，常常一边拉着近处的桌子，一边还以颇具震慑力的口吻宣布，那个那个也是他的，手腾不出来，就目光下巴并用，盯着他们认为属于自己要占领的目标点头警告别人不能挪动。身瘦胆小的就只好拼凑条凳，以之为床，久而久之，便成了定式。也有敢于冒犯

者,凭什么你们总占那么多桌子,于是半是试探半是挑衅的去搬动早已打上了“烙印”的课桌来拼床,这个时候轻则再被夺走,重则剑拔弩张,要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班干部这时候就要发挥权力的作用,及时出面调停,这种“自治”的管理手段却也屡屡奏效。可笑当晚的怒目相向,翌晨醒来又似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下“床”叠被堆码,挪开桌凳,瞬间又复原教室的模样,近而渐入早读佳境,一切都来得那么快捷而自然。

那时候的幸福感似乎极易找到,就如被褥这些东西,农村孩子一般是很难独享的,可读了高中,再要住宿,我们从家中背走一床棉被是再理直气壮不过了,哪里会去感受父母为此所受的作难,被子一旦扛上肩,拥有者是何等的满足和幸福!然而读书两年,一条被子夏也铺冬也盖,“床”又不能宽展,那时年少,睡觉偏又不老实,尤其冬天的夜晚钻进被筒时还颇为规矩,可到了早晨,不少同学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蜷缩在“实木”上,而冰冷的桌面或条凳面早被体温传导得温暖而舒适。我就常常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光板凳上,可奇怪的是从未因此而患上感冒,即使睡梦中不时被从未支稳过的板凳缝隙夹住皮肉疼痛而醒,也未曾体会出苦难为何物。相反,一天到晚总快乐得让老师为之着急。最难忘是周六晚的值班,同学们都回家而去,留下值班的同学顿生主宰世界的宏念,平日里一条被子亦铺亦盖,这时候倒想体验当皇帝的感觉,铺一床褥,盖一条被的欲望顷刻间膨胀起来,于是吃过晚饭,就早早地拉开桌子拼出大大的一张床,再把垛子上的

被子先拉下来的作褥,后取下的为被,神仙似的钻进去,美得久久不能入眠,闲话就一直聊到没有时钟见证的深夜。有一次,几个值班同学一时兴起,以为铺得越多盖得越厚越暖和,一口气就取下八床被子为褥铺其下,再拉开七床被子叠覆其上,以为这下就是神仙了,结果冷惯了的身子“虚不经补”,第二天全都感冒上火发起烧来。此事一经传开,成为校园里好一段时间热议的笑谈。

高中那两年的学习颇有传奇色彩。高一时课程还比较正常,只是“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占去课堂时间太多。学军似乎只在开学初,由当地驻军战士带着我们在学校操场军训过紧张而刺激的一阵,之后便归入了体育课的训练,可学工、学农的实践课却一直跟着我们。那时候,对书本之外的实践课人人兴趣十足,譬如学工,“课堂”就在校办工厂里,大致是修理电动机、压闸刀盒之类的趣味操作,既与物理课相联系,又能满足好奇心,所以每到此时,几乎未到整队出发时间,有人就捷足先登,踊跃而往。由于设备太少,轮流操作时,后边的同学就有些急不可耐,心管不住手去乱动别的设备,因此常遭管理人员的呵斥。而过了一把操作瘾的同学虽干得汗流满面,却因满足了好奇心,又有小小的劳动成果可以炫耀,就显得兴奋不已。学农的课程同样提人精神,因为这种活动往往安排在周三或周五的下午,全校师生集体行动,扛着锹镢,拉着架子车,长龙般浩浩荡荡走出校园,穿过天下祖庭——祖庵古镇的南北正街,长龙般朝着南边的甘峪河滩逶迤而去。那里确

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满地的石头如兔如鸡又如狗，半伏在黄沙细土中，煞是壮观，你可以一个方向超前走绝不会有人挡道，可脚下的顽石却绝不容许你满不在乎于它的存在，稍不注意就会让你或伏于地或仰于天，受尽跌打损伤之苦。我们的任务就是以“有为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在那里改滩造田，而且是要在千年石滩上造出一个桃源胜境。这样的宏伟蓝图虽然是借用了中学生的微薄之力去绘就，可如今想来，那个岁月能有如此创意，也叫人无法不为当时决策者的远见卓识而叫绝。记得浩荡的学农队伍一开到教学现场，虎虎生威的学子立即就以“铁肩担道义”的气概三人一组、五人一合极是投入地作出临战之状，摩拳擦掌在预先洒了白灰的圆圈上挥镐舞锹大干起来，按规定所挖的坑要一米的直径一米的深度，然后再去远处地里抬来黄土回填进去，才可以交上“作业”。这种活极是符合中学生的心里特点，比着力气的大小，还一个不服一个，虽干得热汗淋漓，却兴奋得心花怒放，毕竟比闷在教室来得自在。所以这半日时光里，偌大一片荒寂的乱石滩因了我们的到来热闹得如三国的古战场，连远处耕作的农夫也不时驻足观望，为之喝彩。别看少年自有一股冲天狂劲，可干不过一半，渐渐地就像皮球在泻气，开水泡馍的午餐怎耐得住如此大热量的释放，所以，每次返校时，队列的浩荡之势锐减，我们全像散兵游勇一般涌入校门。可到了下次活动，就又来了精神。学工、学农的“锻炼课”的确挤占了我们太多本应是课堂涵泳的时间，这实在是中学

时代一大遗憾。而这种遗憾在随后恢复了高考的考场上始得验证，面对考卷，力不从心的焦急才使我们顿悟当年“出力不当”所带来的切肤之痛。

其实对于文化课的学习，我们这一届学生还算是歪打正着占了点便宜。一九七二年夏，初中本要毕业，政治暴风怎么突然间在我们小小的校园里也回卷不息，少不更事的中学生旋即被卷入其中，待风势稍减，睁眼看世界时，已到了这一年的深冬，我们的初中学制就这样先被不明不白减去一年，又莫名其妙被延长了半年。所以初中毕业从我们这一届改秋为春，反了季节。原本是“红小兵”跟着潮流“大批判”，小小之心已荒芜不堪，不料高中升学考试的消息“忽如一夜春风来”，让饱受“推荐”不公而倍感压抑的我们顿觉“出头之日”即临，立刻生出“搏一下”的壮心，用功复习了一阵，不少人竟也如愿以偿，居然打破“推荐入学”的“常规”自己把自己送进了高中，这实在是让人引以为豪的事情。所以进了校门，我们对文化课学习相对就自觉一些也珍惜一些。高一时，尽管学工学农的活动占去了我们很多读书时间，但还是觉得学有所获。可到了高二，本不晴朗的天空又风云大作，忽然间掀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一夜间学校又变成了大批判的战场，各种大字报挂满了校园，贴满了墙壁，学校的秩序真又回到我们初中的时候。“大批判”的热浪再起，我们怎能不卷入其中？时隔这么多年，仍依稀记得我们是如何不知天高地厚，以虾蟹之力在那场运动中做着推波助澜的忘形

之举。尤其是出自我们笔端的那些批判稿实在是幼稚可笑又咄咄逼人，打油诗也似乎敢于藐视李、杜。有老师看不过眼却又不得不压抑着声音说，你们写文章能不能学会以理服人，怎么总拿吼文滥句自壮声威？有一次，我们正在张贴壁报，一个语文老师看着墙上的批判诗歌慢条斯理地说，时势造英雄啊，时势也出诗人，只是读你们这些诗的时候，以筷子敲碗，或以竹板辅之更能逗人。话中的辛辣味听得分明，可正在为自己的墙头诗自鸣得意的我们一时却没了对答，乃至那老师走后，才有人后悔怎么当时不就地揪住他批判一通。三十六年过去，而今提及，当年的“小闯将”谁能不为自己那时的狂傲无知而自羞自惭呢？

更费解的是怎么就兴起了“评法批儒”之风，那时的语文教材本就视古文为“糟粕”，加之“之乎者也”那样的句法也实在生涩难懂，令人讨厌，所以对古文的学习仅限于“知道”而已，而转眼间面对要大加译评的法家著作和同样要大加批判的儒家“谬论”，我们这些与古文相识不过三、五篇的“小斗士”别说观其文如蚂蚁读大典，就连其中文字也识之未半，可我们却有自命不凡的胆量，居然也敢摇动手中的幼稚之笔来做译评，其结果自然是笑话连篇、洋相百出，还自鸣得意拿到批判组要求刻板印发，接稿老师当然都是古文高手，可政治气氛的浓烈使他们既不敢将到手的“大作”鄙之为“朽木”，却也无从下手去“雕凿”，弄得左右为难。有一个老师不无嘲讽地对这样的译评叹道：“这简直是气死木匠，恹

死画匠，吹糖人的见了哭一后晌。”意既此等无规无范的译评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然而不“雕凿”怎么能完成政治任务呢？批判组的语文老师还是得从牙签里面挑旗杆，拿出一批“成果”去交差，可老师们万没想到，“革命性”更强一些的小将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向党之心，居然在自己的姓名前特意加上了“中共户县第八中学”的修饰语。这实在让老师哭笑不得，却也只能温和指出其中谬误，然而“作者”不仅不认可，还要据“理”力争，而别的“小译评家”在这样的争辩中也多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直至我多年后参加了工作，在下乡的路上看到蔬菜地里一座小土房的墙壁上用白灰水刷上去“中共××村菜园子”的醒目大字，不禁在哑然失笑中才明白了老师当时纠错的含义以及自辩者的好笑。

那一场运动来势凶猛，看似一件坏事，可我们这一届学生总能碰上逢凶化吉歪打正着的时运，因为班主任邵步越是一位出色的语文老师，又有教政治、历史课的经验，他那时大概从我们极欠古文功底的“译评”和“吼文滥句”的作文中看出了可畏后生的可忧之处，也大概从那一场政治风暴中悟出了如何创新的施教之法。所以语文课就教得颇有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从他赋原有教材以新意，增“应景”之章为补充，并付诸实施而体现出来的，加上他极具感染力的口授方式，连那些见上课就伏桌的“瞌睡虫”一旦到了语文课堂上也会听得屏声静气，忘了睡觉。邵老师善于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写作，上记叙文课程时，一篇范文教完，随之就有作文练习，而且是命题、

作文当堂清,下一堂课进来就是讲评,甚至不止一次带着我们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去感受生活,以习练长篇通讯的写作。如此一段时间下来,记人叙事、状物摹景的写作就有了明显进步。对于政论文的学习,我们在顺应时势的同时,并没有失去教与学的目标,大批判的稿子邵老师也一篇接一篇布置同学们去写,但并非盲目从事,而是借机拿出中共抨击苏共的《九评》作为范文来解读,以此教我们学习政论文的写作方法和技巧。这样循序渐进写过多篇之后,说理之功果然见效。接着又把法家著作补充进语文教材,还让我们一口气学习了《曹刿论战》、《唐雎不辱使命》、《谏太宗十思疏》、《捕蛇者说》、《六国论》、《过秦论》、《邹忌讽齐王纳谏》、《岳阳楼记》等十多篇经典古文。就连古体诗的学习,也特意把《毛主席诗词》印发给我们。那段时间里,每天早上,唯听高七四级三班教室里书声朗朗,颇能感人。毛主席三十六首诗词从学子口中荡漾到校园上空,成了令全校师生惊之讶之又莫可奈何的传闻,半学期下来,我们居然人人能把毛主席诗词逐篇背诵,在那种时代背景下,能有这样的学习收获,算得上是火中取栗的偶得。如果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们班考入大专院校的数量在全年级中占了优势,用同学们的话说:“非邵老师的妙招,哪有歪打正着的收获”。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同学中后来竟有人连律诗也写到让行家都惊叹的地步。而我们大多数人语文基础的奠定,也都得益于那一阵的练习。

师生相聚,忆旧是不衰的谈资,而拾趣最

能热烈气氛,就如“恋爱”这样的话题吧,有四张“靶子”永远是大家瞄准的目标。像温新年与李惠琴的恋情,当年同在窗下就读时,他俩看似不动声色,让人毫无察觉,可后来才知道此君早有“贼心”只乏“贼胆”,乃至走出校门,在东张西望了一阵之后,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迫不及待就钻进罗霄帐,做起了鸳鸯梦。至于李春锋与李敏芝这一对,其爱情的收获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同窗秉烛的时候,男主角还是呆头呆脑、憨态可掬的傻小子,女主角更是一心向学、娇羞欲滴的小姑娘,似乎谁也无意于谁,乃至走出校门,少男少女的春心一夜间突然起跳,于是茫茫人海中“众里寻他(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见钟情的是熟不可言的常见客,相见恨晚的是视而无睹的意中人,他们在稍纵即逝的羞涩之后便撇开月下老,勾起手就零过渡地做起了恩爱夫妻。想当年,高七四三班四十八名学子,女生仅有七名,而两朵名花一夜间竟让他俩摘走,等大家明白过来,谁不捶胸顿足,疾呼“悔之晚矣”!这简直让我们别的同学嫉妒了好久,又羡慕了好久。不过他们的姻缘也确是天作之合,美满而幸福,连爱情的果实也硕大无比。温新年与李慧琴的爱女从北京的一所医科大学读完研究生,转身就被学校以才女相留,成为攻克癌细胞这一世界医学难题的白衣天使;而李春锋与李敏芝的虎子则从清华大学的门前起步,直做了核研究的专家,我们这些当叔叔、阿姨的能不引为自豪吗?还有,众所周知的周联社和李春波,他们可能还未及像我们一样

●我与西安●

把前面那两对宿命鸳鸯先嫉妒一阵，再羡慕一番，而是一出校门，懵懵懂懂就撞开了婚姻法的阑珊，无所谓“偷”，也无所谓“摘”，直接就尝到了爱情的禁果，好在法律念及他俩幼年丧母，网开一面，睁只眼闭只眼成全了他们的早婚。然而“成全”的后果却是不堪设想，五十挂零的周联社和李春波，用我们那时写作文的语言称呼，充其量也就是“年过半百的周大伯和李大伯”，可他们却在十多年前都作了爷爷，弄得我们同学中结婚最晚的李朝林的孩子竟然同他俩的孙子成了同辈人。称呼上出现艰涩的难堪，先是李朝林拒绝面对“降辈”的残酷现实，可又有嘴难辨；而周、李二人更是不依不饶，摆定了“大爷”的架势，一场同

学间“辈分之争”的“官司”在那天的酒桌上从进门见面打到酒之将尽也没了个了结，连向来明断的邵老师在这样的话题面前也只有仰头大笑的份了……谈笑间已有人交耳欲起，似要先行离座了。一回首，才发现窗外的夕阳已近衔山时分。

日月短，光阴流，遐思绵长，忆旧何时休？想那中学时光，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情景实在太多，就如涟漪叠起，心湖那堪平静！热闹的趣谈还是为下次相聚留一点吧。大家毕竟还要为稻粱谋，能拿出今日这宝贵时间已实属不易了。于是我们同声提议：共举桌前杯，一饮而尽之。就这样，一群聚合之众又纷纷回到了寻常生活中……

·知识窗·

误用“乡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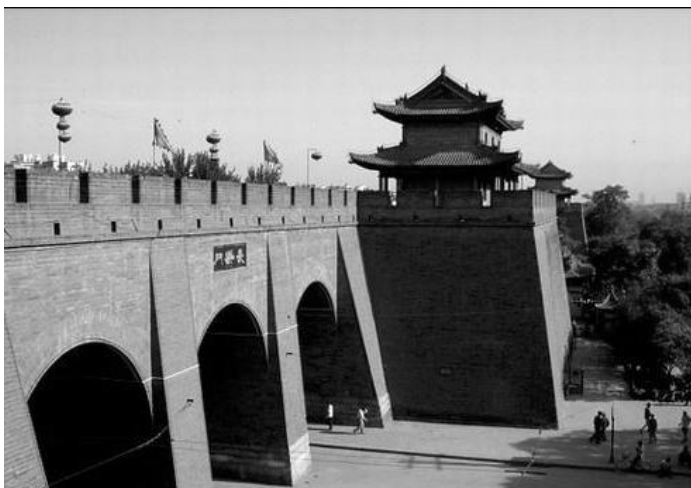
“乡愿”一词古已有之，《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均收有词条。指乡里中伪善欺世的人。但是现在人们往往望文生义，对“乡愿”一词多有误用。

“愿”现在作“愿”的简化字，指心愿、愿望等。古汉语中其实也有“愿”字，指“质朴”、“恭谨”。《书·皋陶谟》：“愿而恭。”孔颖达疏：“愿者，慤(què，诚实，谨慎)谨良善之名。”古代此义使用非常普遍。如“愿民”即朴实善良之民，“愿洁”即朴实廉洁，“愿法”即执法恭谨，等等。此“愿”有时也写作“原”。

“乡愿”即乡里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也作“乡原”。孔子称之为“德之贼者”。《论语·阳货》：“乡原，德之

贼者也。”朱熹集注：“乡者，鄙俗之意。原，与愿同……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

《孟子·尽心下》有段孟子与万子的对话，解释孔子为什么称“乡愿”为“德之贼者”。万子一次问孟子：一乡的人都称他是忠厚人(愿人)，所到之处他也表现出忠厚、质朴的样子，孔子却称之为戕害道德的人(德之贼者)，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这种人要批评他却举不出事实来，要指责他却又没有什么可说的，和颓靡的习俗、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平时似乎忠厚老实，行为也似乎很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也自以为不错，但不能与他学习讨论尧舜之道，所以他其实是戕害道德的人。



西安古城墙之城墙典故(二)

四、“十里飘香入夹城”

唐代中期,社会经济日益繁荣,长安城的宫苑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适应唐玄宗李隆基等最高统治者日益追求玩乐享受的需要,为达其暗中往来大明宫与兴庆宫及潜行去芙蓉园游乐,沿长安外郭东城壁修建了两道夹城。

唐玄宗李隆基自先天元年(712年)八月即帝位,先在西内太极宫听政。开元二年(714年)六月徙居大明宫,与此同时,在长安东城春明门内偏北原隆庆坊营建兴庆宫。兴庆宫的主要建筑如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兴庆殿、南薰殿等,都是楼式建筑,比起太极宫大明宫来,宫殿建筑更为高大和豪华。而且兴庆宫内宫殿建筑相对较少,而以风景园林为主,如其南部有兴庆池大水面湖色为中心的风景区,池岸垂柳细杨,沉香亭前名花盛开,四时景色宜人。开元十四年(726年),唐玄宗的活动中心逐渐由大明宫向兴庆宫转移,为往来于两宫不使百姓窥见其行踪,沿郭城东壁之外,修筑

了一段由大明宫南通兴庆宫的夹城。

开元十六年(728年)正月三日,唐玄宗正式由大明宫移仗于兴庆宫居住听政。此时都城东南隅的风景区曲江与皇家御苑芙蓉园,也得到大规模扩建营修。当时,一方面开凿黄渠,从南山大峪口引漓水北流注入曲江池,使池面扩大到约70万平方米;另一方面沿池畔营建行宫台殿,从而使曲江沿岸宫殿连绵,楼阁起伏,垂柳成行,烟水明媚,成为胜境。位于曲江南岸的芙蓉园,这时也增建了紫云楼、彩霞亭等亭台楼阁,并对湖池园林加意修凿点缀,遂使园内“青林重复,绿水弥漫,帝城胜景也”(《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芙蓉园)。

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为了随时从兴庆宫暗中潜行至郭城东南隅曲江与芙蓉园游幸观景作乐,又傍郭城东壁南段之外,修筑了由兴庆宫南通芙蓉园的夹城。夹城南端城门名新开门,故址在今西安东南郊新开门村附近。

以上郭城东墙外的两段夹城,北起大明

宫,中经兴庆宫,南至芙蓉园。据考古探测,此夹城北起今胡家庙北约200米处,南至今新开门村120米处,与郭城东墙南北平行,共长7970米。夹城中间的通道,宽约23米。唐代诗人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诗中有“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旌”,“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就是描写唐玄宗及后来唐代皇帝与后妃们从兴庆宫或大明宫通过夹城到城东南芙蓉园游幸玩乐时的情景。

五、唐宫城旧迹西五台

今西安城玉祥门内南侧的西五台,是隋唐长安宫城南墙的一段旧迹。它历经沧桑,见证了西安城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变迁。

隋唐宫城位于长安城北部的中心,筑于开皇二年(582年)六月至三年(583年)三月。宫城南接皇城,四面筑有城墙。东西长2820.3米,南北长1492.1米,周长8.6公里。宫墙为夯土板筑,墙高三丈五尺(合10.3米),墙基宽约18米左右。其南墙在今西五台一线向东,经莲湖公园南墙,至新城省人民政府大院处;东墙在今西安城革命公园西端,向北经尚平路一线;西墙与今西安城的西墙在同一直线上;北墙为外郭城北墙的一部分,位于今西安北门外自强路之北。

唐末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正月,军阀朱全忠强逼唐昭宗迁往洛阳,并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年三月,留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缩建长安城,放弃宫城与外郭城,仅以皇城改筑为新城。于是拆除了宫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而保留了宫城南墙为新城(即唐皇城)的北城墙,时西五台处仍为唐末至五代宋金元京兆府城北城墙的一段。

明代初期,为了加强西北重镇西安的防卫和准备秦王来西安就藩,于洪武七年至十一年(1374~1378)扩建西安城。这次扩建,主要是在原唐末韩建新城(即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向东向北各延伸二分之一。于是拆除了原皇城东城墙(在今开通巷之东向北一线)向东扩展至今东城墙址;拆除其北城墙(在今西五台向东一线)向北扩展至今北城墙址。西五台就是这次拆除原宫城南墙后为新城北墙留下的一段基址。因其从东向西起伏有五个高台,又在城之西,故称西五台。台上因势建有尼寺,因其殿阁高耸,称为云居寺。明清以来,香火极盛,亦为西安城内登眺美处。[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古迹》称:“西五台,在城内西北隅,唐西内城址也。累累如大陵者五,三、四台尤高耸,上建崇阁,供人观眺。长安邑志所谓俯视闾闾,佳气蓊茏,亦城内山林也。”

六、西安城门与楼皆三重

明清西安城的四座城门,皆为门三重与楼三重之制。即每座城门外,都建有瓮城与月城,而在内城门、瓮城门与月城门之上,都建有正楼、箭楼与闸楼。宏伟壮观的座座城楼,高厚坚固的重重城垣,不仅成为西安城标志性景观建筑,而且也是古代城堡中最为完备和坚固的城防系统工程。当然,这种建制的形成,是经过了明初的二重制到明末的三重制的逐渐完善过程。

明初洪武七年至十一年在扩建西安城垣时,四座城门的修建成为城墙防御体系中的主要建筑和重点工程。当时,对保留下来的原隋唐皇城安上门(明南门永宁门)与顺义门(明西门安定门),及新建的东门长乐门与北门安

西安地名拾趣

◎ 张树森

地名是地方的指称,它的命名总是包含着不同寻常的由来和含义。西安历为周秦汉唐京畿之地,目前正在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西安地名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文化品位,形象、生动、风趣。

以数字为首的:一德、二曲、三兆、四屯、五楼、六村堡、七渠村、八府庄、九间房、十里铺、百堡、千户、万合。

以数序排列的:谢一、谢二,北张一、北张二、北张三、北张四,东一道巷、东二道巷、东三道巷、东四道巷、东五道巷、东六道

巷、东七道巷、东八道巷、东九道巷、东十道巷。

以颜色为首的:红色、红岩,黄堆、黄土,蓝关、蓝桥,白村、白庄,黑坟、黑沟。

含动物名称的:狮寨、马沟、白鹿村、龙村、羊村、老虎沟、鲸鱼沟、骆驼岭、野猪窝、蚂蚱滩、凤凰岭、骡马市、鸽鹄岔、鸭池口等。

与植物有关的:大白杨村、橡树坟、松树沟、栗子坪、槐树村、柏树林、竹园、枣园、杏园、菊花园、柳巷、柳树林、马莲滩、苜蓿沟、南石榴村等。

以五行为名首的:金山镇、

远门,按照“二重”制的形制进行了改建与新建。即在每座城门口外,建有环拱城门的瓮城,并在内城门上建正楼,在瓮城正门之上建箭楼(南瓮城正墙下不开门),门与楼皆为内外二重制。这从明嘉靖与万历年两部《陕西通志》所绘《西安府城图》中可以看出,四城门外只有瓮城而无月城,只有正楼与箭楼而无闸楼。时四瓮城门外护城河上,似绘架有过河的便桥。

大约在明末崇祯九年(1636年)时,陕西巡抚孙传庭为防止农民军攻城,在修筑西安四关城(东关城明初已建)的同时,完善城门防御体系,在四门瓮城之外再建了月城,并在月城门上建闸楼,以起落的吊桥控制护城河上的入城口,从而形成为“门三重,楼三重”之制。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十一日,李自成农民军在围攻西安城的战火中,曾焚毁了东门正楼与南门月城楼,这也说明此时西安月城与闸楼已经存在。

明末被毁的西安东门正楼与南门月城楼(即闸楼),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陕西巡抚陈极新在重修西安城时依照明代旧制重建。以后清代曾多次葺修西安城门与城楼,但这都是按照明代城门与城楼皆为三重制进行的。[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重修西安城“门楼三重,正楼、箭楼、炮楼(亦称闸楼),自内而外……皆如旧制”。这里所指“旧制”,就是指明西安城已形成的城门与门楼皆三重之制。

●西安风情●

金盆村,木家沟、木竹坪,水寨、水磨,火石沟、火烧寨,土门、土岭。

以方位或对称定名的: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惠东村、惠西村,草南村、草北村,南江兆、北江兆、中江兆,阳坡、阴坡,前村、后村,高堡子、低堡子,旧寨子、新寨子,上鲁峪、下鲁峪,大岔口村、小岔口村。

因山因水得名的:清华村、骊山镇、翠华路、太白路、甘河镇、北洩河村、甜水井、涝店、灞桥镇、大峪口、徐家湾、北石桥等。

具有吉祥之意的:杨善寨、太平堡、太平村、聚宝村、乐居场、吉祥村、长安路、幸福村、永宁村等。

姓氏地名:杨家村、张家村、李家壕、卢家口、申店、魏寨、白家坪、葛牌镇、吴高墙等。

观庙寺庵地名:延生观村、楼观堡、东岳庙村、红庙村、太阳庙门、崇皇寺村、罗什寺堡、神峪寺沟、祖庵镇等。

以古建筑、古墓葬或历朝著名风景地命名的:大雁塔村、含元殿村、夹城堡、天禄阁台村、灵台村、吴家坟、陈平坊、里花水村(定昆池)、曲江池村、上林苑、阿房宫村等。

东晋十六国时期民族迁徙和明初实行卫所军制形成的:东宁羌、西宁羌、羌村和岳旗寨、袁旗寨、闵旗寨、后围寨、马旗寨等。

以古代历朝官职或将领命名的:司马村、待诏村和罗开山寨等。

在沿用传说故事、事件取名中,有以王莽追捕刘秀故事取名的王莽村、刘秀村。以历史上脍炙人口的鸿门宴故事取名的鸿门堡。以北宋传说穆桂英招婿故事取名的穆柯寨。以相传唐人裴航与仙女云英忠贞爱情故事“梦

断蓝桥”取名的蓝桥镇。以秦末权臣赵高策划“指鹿为马”一幕而取名的鹿马村。以千载流传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取名的三过村。以魏晋时嵇康等七位文人称为“竹林七贤”典故取名的七贤庄。以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忠贞于爱情的故事创作之秦腔剧五典坡取名的五典坡。以“泾渭分明”成语出于地取名的泾渭堡等。

体现政治、时代特色的:除有解放、翻身、建国、红卫、东方红、向阳红、革命、文革、红旗、跃进、东风、兴无、红星、防修、星火、燎原、五一等等之外,还有以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取名的友谊路、以与长乐路并行采用毛泽东诗词“今日长缨在手”句取名的长缨路等。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一批与时俱进的以高新、科创、科技、航天、博士、硕士、学士等命名的地名相继问世,既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时代特点,又表达了广大群众对科技、人才强市的愿望和要求。

共用地名,即一个地名多个区县皆有:如十里铺、小寨、大寨、曹家堡、张家堡、白庙村、寨子、书院门、后村、孟村等。其中小寨地名不仅灞桥、雁塔、蓝田等区县有,且在蓝田县县域内就有四个小寨地名。并有谐音演变、雅化、讹化或讹写的地名如:御下演化为余下、三门口村演化为山门口村、上村演化为尚村、啗齿村演化为卓日村、皇粮村演化为皇良村、附子村演化为父慈村、墩子镇演化为厚子镇、鹤池寨演化为河池寨等等。



盛唐华清宫

初建始自西周

1982年4月的一天，人们在骊山脚下基建施工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建筑遗迹，像是洗澡用的池子。经专家考证，这是唐代华清宫的建筑遗存。随后考古队成立，开始考古挖掘。就这样，这座中国最为壮观的温泉宫殿，在消失了1000多年后，终于重现世人面前。

专家首先挖掘出的一座汤池遗址，不仅结构极其特殊，而且池壁也十分特别，有的地方凸出，有的地方凹进。后来又发现了一些刻有工匠名字的条砖，这种条砖是初唐时期才有的建筑材料。专家判断，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专用的汤池。

随着考古的进行，专家们在唐华清池遗址的下面，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陶质水管道，秦汉时期的木门、瓦当等建筑遗存。专家发现，原来唐太宗李世民并不是最早在骊山建造汤池的人。温泉宫殿早在周幽王时期就已存在，

后来几代天子都将这块风水宝地作为行宫别苑，不断扩建。而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修建汤池，赐名为“御汤”，并把重新翻修好的宫殿起名为“汤泉宫”。

唐玄宗时期达到巅峰

然而，唐太宗修建的“汤泉宫”并非历史上最恢宏的时期。令温泉宫殿达到历史上最宏伟鼎盛的，是一位传奇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唐玄宗统治时期的盛唐，国家基础雄厚，民富国安。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下，每年10月，唐玄宗都要偕杨贵妃和朝廷百官来骊山过冬沐浴，尽情作乐。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返回京师长安。

随着游幸队伍日渐庞大，原来的行宫已不能满足唐玄宗的要求。于是，在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唐玄宗下诏，花费巨资，大规模扩建骊山行宫。由于唐玄宗是个十分笃信道教的人，因此在天宝六年，新宫落成时，唐

●西安风情●

玄宗便取道教经书中的“华清宫”能使人得道成仙之意,把骊山宫殿正式定名为“华清宫”。又因为宫殿坐落在温泉汤池上,所以也称为“华清池”。而唐太宗李世民曾经用过的“御汤”,也被唐玄宗改名为“星辰汤”。

先后发掘清理出 9 个汤池

星辰汤出土后,在星辰汤的北面约 20 多米的地方,考古专家又发现了一个汤池遗址。这里出土了天宝年间的铜钱、三彩套兽,特别是带有手印的条砖,这种条砖是唐玄宗天宝年间使用的一种建筑材料。根据宋代游师雄在《长安图志》中所画的位置,结合汤池造型及出土文物,专家判断这个是唐玄宗沐浴的莲花汤。

在莲花汤西边约 3 米的地方,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里出土的汤池用青石砌成,造型别致,形似一朵盛开的海棠花,面积约有唐玄宗莲花汤的 1/6 大。专家判断,这是皇帝专为杨贵妃修建的海棠汤。

随后,根据宋代游师雄在《长安图志》中所画的位置,考古专家又陆续发掘出了几个形制各异的汤池,共 9 个。

唐华清宫整体规模重现

唐华清宫的考古挖掘工作持续了 14 年,专家们除在山下发现的 9 个汤池遗址和梨园遗址,在山上还发现了集灵台、朝元阁、老君殿遗址,这些遗址的位置、形制与史料记载的完全吻合。

唐华清宫由骊山禁苑、皇宫、昭应县城三个部分组成。所有宫殿建筑均部署在缭墙内,栉比鳞次,错落有序。

宫城有四门:北为津阳门,南为昭阳门,东是开阳门,西称望京门。

宫内分东、中、西三区,以隔墙分开。东区是唐玄宗和后妃沐浴、宴饮娱乐的地方。有歌舞音乐场所——梨园,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寝殿——飞霜殿,及莲花汤、海棠汤。中区有皇帝处理朝政的前、后大殿,及太子、官员等沐浴的汤池。西区建筑与唐玄宗希望得道成仙有关。有祈求得到长生不老药而修建的果老药堂,供奉历代祖宗的十圣殿,供奉神仙、修身养性的功德院等。

骊山上上下下建满了宫殿亭台,著名的有长生殿、朝元阁、老君殿等。“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合殿环列,难以胜数。但公元 755 年 10 月发动的为期 8 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玄宗从盛世的顶峰一落千丈,华清宫也因此后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再也没有达到唐时期的辉煌盛况。经过多年风雨侵蚀,烈日暴晒,大多数建筑年久失修,山上泥土冲积掩埋。中国历史上最为恢宏的皇家温泉宫殿,就这样慢慢消失在了历史的风烟中。



狄寨徐文岳泥哨制作技艺

富小云 整理

“泥哨”，俗称“娃娃哨”，又称“泥叫叫”，是陕西关中的民间玩具。据说源自西安清末民初的鱼化寨，是一种彩色的低温陶玩具哨子，造型丰满、简练，以戏剧人物为主，也有形体小巧的胖娃、小动物，最小者仅寸余。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20 来岁的徐文岳开始学习制作泥哨，至今已 50 余年。一个“娃娃哨”，从取土、和泥到

制坯、模子成型、透哨、晾晒、烘烤、彩绘、罩油等，要经过十多道工序，历时三四天才能完成。所选泥土不仅要有粘性，而且一定要未被污染的。这些用模子做出的泥人原型，经过几天的晾晒、烘烤后，再给它们画上眉毛、胡子和花花绿绿的衣服，这些泥人就变成了“赵子龙”、“姜子牙”或“二郎神”等。头上有窟窿的泥人，一吹就可以发出声音，叫“娃娃哨”。窟窿在脚底下的泥人吹不响，只能插在祭祀盒子上面，叫“祭祀泥人”，用于丧事送礼。

2007 年 5 月，狄寨徐文岳的手工泥哨制作技艺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被确定为西安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安风情·

报恩寺街

◎ 彭栋为



报恩寺街位于西安城内西南部，是一条东起太阳庙门西口、西至甜水井街东口之东西走向的小街巷。该街以有历史古刹报恩寺而得名。报恩寺的最早名称叫懿德寺，建于唐代。安史之乱后，此寺被焚毁。元代至元年间(1335~1340 年)，该寺遗址被元顺帝赐予一位蒙古贵族建成花园。后因时见园中石像熠熠生光，是

为“神佛显灵”，复将花园改建为寺，敕额“大兴国报恩寺”。比及明朝建立，秦王朱棣坐镇西安，又一声令下，拦腰砍去前面三字，由此而成“报恩寺”，而寺前的这一条街巷，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作报恩寺街。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对该寺进行大规模修葺，而寺名则依前称，街名也沿用至今。

新城、未央三区调研指导工作 市地方志办主任冯艳阳到长安、

近期,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副主任姚敏杰、纪检组长任昆明携各处处长,先后到长安、新城、未央三区调研地方志的机构、人员、经费情况及二轮修志进展情况。

在听取了长安、新城、未央三区主管区长和方志办领导工作汇报后,冯艳阳主任对以上地区单位的工作进行了肯定,并对今后各区县地方志工作进行了部署,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区志办要以陈宝根市长签署的第82号令——《西安市地方志管理办法》中的“区(县)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是主管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常设机构”为契机,集思广益,多方努力,想法设法使我们区县志办成为独立机构,能有两个以上的人员编制,再聘请一些文字功底较好,能够耐得住寂寞,肯俯下身子钻研业务的老同志。这样的

话,才能更有利于我们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二、区志办要尽快挂牌,切实履行好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三、孙书记4月26日到我办调研时指出“地方志办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进一步为大力推动我市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丰富我市文化特色”。区县志办要以孙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导方向,切实在志书的“资政”上下功夫。四、区县要提高对综合年鉴重要性的认识,尽快启动综合年鉴的编纂工作。

新城区区长李德文,未央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贺简政,长安区档案局局长宗峰等主管领导都表示要把地方志的机构编制问题、经费与人员问题、志书“资政”、综合年鉴的编纂等工作落在实处,干出成绩,不辜负职责使命。

《周至县林业志》通过二审

2010年4月23日,《周至县林业志》评审会在县林业局召开,县志办领导及评审组成员、县林业局领导及修志人员共12人与会。评审会由《周至县林业志》二审委员会主任王耀群主持。

会上县林业局原党委书记焦彦文介绍了修志工作情况,《周至县林业志》主编王景权介绍了志稿概貌和编纂情况。

评审组成员在对《周至县林业志》认真阅读、审核的基础上,从志稿的结构体例、资料编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点评,充分肯定了志稿的编纂工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最后,县志办主任王耀群对评审会作了小结,肯定了志稿是一部全面反映周至县林业发展全貌的通志体史料集,整部志稿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可读性强,符合志书编写体例。他要求林业志编纂人员认真研究、借鉴和参考评审组成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志稿进一步进行修改、完善、补充和提高,使其成为一部具有一定收藏价值的周至县地方志系列丛书之一。

孔子的 “周游列国”



从 55 岁到 68 岁，孔子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周游列国。据记载，孔老夫子当时周游的有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国。从《孔子历史地图集》书内“孔子周游列国图”标注的路线图来看，孔子周游所及的地方，范围不出今天山东省和河南省境内。

历时十数年，足迹不过两省之间，孔子的旅游路线在今天看来，真是太短了。

比孔子稍晚的战国时代，秦王邀赵王在渑池见面。秦国势强，赵王不敢不去。由蔺相如陪同出行。大将廉颇送行。廉颇在边境上说，这一去一回的路程，加上会见的时间，估计得 30 天。如果你们 30 天还不回来，我们就立太子

为王，让秦王无从要挟。这里所说的边境是哪里不得而知，但即使从赵都邯郸算起。到河南渑池的距离，不过 300 多公里。今天走高速公路，只有半天的路程。而在廉颇的概念里，少说也得七八天。古今的不同，可想而知。

虽然和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不是一回事，但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周游列国”仍称得上是一番壮举。



“左右之分”：右尊左卑

成语“无出其右”，“出”是超过，“右”是上，古代以右为上位。典故出自《汉书·高帝纪下》：“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颜师古注：“古者以右为尊，言材用无能过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宋孝宗《经进东坡文集序》：“东坡忠言谏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古人以右为尊，所以右还引申为尊尚，表现在众多的称谓：高级职位称右职；崇尚武功称右武；崇尚文治称右文；豪门大族称右族、右姓；皇帝的贵戚称右戚；太学称右学；西部地区称右地（不知和我国西高东低有无关系），等等。

古人以左为卑，说法更多，官员被贬谪称左迁、左除、左降、左转，白居易《琵琶行》序中就有“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低于中央政权的官称左官；左顾还是谢人过访的谦

词，类似现在的垂询、垂问；差错、错误称左计，范成大有“无事闭门非左计，饶渠屐齿上青苔”；不顺、不和，称相左；邪、不正，称左道，不正派的学术流派、宗教派别称旁门左道；左还有不帮助、反对，不当、不便的意思，《左传》有“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并解释“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为右，不助者为左”。不知这是不是右尊左卑的滥觞。

不过，左也有风光的时候，有个成语“稳操左券”，是说古代的契约称券，分左右两片，双方各执其一，左片称左券，由债权人收执，作为索偿的凭证。持左券者有主动权，故对事情有把握常用“稳操左券”。

左和右还有多个义项，很多是中性的，如成语左右逢源、左右开弓、左邻右舍、左思右想、左顾右盼等等，是没有尊卑上下之分的。

·知识窗·

明清“大学士”为何称“中堂”

大学士本为官名。明太祖废丞相，以大学士当顾问，至明中叶遂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起草诏令，批签奏章，官品虽较低，实握宰相大权。因其办公处在内阁，中书居东西两房，大学士居中，故有“中堂”之称。因当时大学士权力较重，所以明代称大学士为中堂者尚不普遍。清朝时，皇权更加集中，朝中设立军机处，此后大学士职权为军机大臣所替代。此时大学士品级虽有提高，但职位反不重要，“大学士”已成空名。为了满足其对权力的要求，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皇帝往往令其管一个部。当时各部的尚书一般满、汉族各一人，就座时，两个尚书分东西而坐，中间空着，如果有管这个部的大学士，便坐在中间，故称这个管部大学士为“中堂”。后来，“中堂”成了美称，只要是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不论其管部与否，都称其为“中堂”。

古代兵士的纸甲

古代两军交战，为了抵御敌军刀剑及箭簇对身体的伤害，士兵们往往会穿上甲衣或手拿盾牌进行防护。甲衣一般说来都是用铁片串连而成。不过，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竟然还有用纸做成的甲衣。

纸甲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用于军事了，此后一直绵延到清代，从未灭绝。《南史·齐本纪》云：东昏侯时，北魏兵压境。“（帝）乃聚兵为固守计，召王侯分置尚书都坐及殿省。尚书旧事，悉充纸铠”。“纸铠”，即用以护身的纸甲。

唐宣宗时，徐商守蒲州，有兵士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透”。（《新唐书》卷 113）这种纸质铠甲，竟然连箭都射不穿，足见其柔韧和安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与后周交战，“民间又有自相率、以纸为甲、农器为兵者，号白甲兵”。（《南唐书》卷三）

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 年）四月，“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一次性制造和分发三万件纸甲，可见这种装备已经是当时的正式装备了。北宋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卷 12 在记载了这条材料之后，又云“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账籍制造”。可见，宋代的纸甲是用陈年账簿即废纸制造的。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的田况也说，“臣前通判江宁府，因造纸甲得远年账籍”。（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2）



南宋真德秀任泉州知州时，上枢密院的奏折称：“所有本寨军器都稍足备，但水军所需者纸甲。今本寨乃有铁甲百副，今当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军换易纸甲。”（《真文忠公文集》）在今人看来，用纸甲防御刀箭简直不可思议，但从真德秀的奏折来看，纸甲的防御能力还要优于铁甲。

明军抗击倭寇时，也使用了纸甲，至于为什么弃铁甲而用纸甲，明人茅元仪的《武备志》总结道：“（南方）天雨地湿，铁甲易生锈烂，必不可用矣。倭夷土贼率用火铳神器，而甲有藤有角，皆可着用。但铅子俱能洞入，且体重难久。今择其利者，步兵性有辑甲，用辑布不等。若纸绵俱薄，则箭亦可入，无论铅子。今需厚一寸用绵密辑，可长至膝。”可见，纸甲并非全用纸，而是纸和丝帛的混合，并且厚达一寸。明代杨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记载了纸甲的制作方法：“纸甲，用无性极柔之纸，加工捶软，叠厚三寸，方寸四钉，（下转第 17 页）”



唐朝人 最怕说“虎”

虎年说虎，蔚然成风。但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唐代，人们是避讳“虎”字的，即使虎年也不能说“虎”——因为唐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566~635）的爷爷叫李虎，李渊当上皇帝后，名不见经传的李虎就摇身一变成了“先帝”、“太上太上皇”，囿于“为尊者讳”之古训，“虎”字自然被全国上下所避讳，因此唐朝人见老虎不敢叫虎，而改称“大虫”，或以“武”、“猛兽”代表，“大虫”一词便是在唐朝产生的。

在唐代，不仅老虎要改名，“犯忌”的人名也得改。跟李世民一道打天下的有一位“虎牙将军”，唐朝建立后也乖乖改称“武牙将军”了。隋代名将韩擒虎，在唐朝修订的《隋书》中则被删去“虎”，变成韩擒了。

梁武帝时，梁、魏两国交战，魏人有“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萧娘和吕姥乃梁军统帅，韦虎指梁国驻守合肥的

将军韦叡，此人骁勇善战，令魏军畏惧。到唐太宗时修《梁书》时，就将韦虎改名“韦武”了。

其他的与虎有关的字眼，统统得改。譬如，成语“骑虎难下”，出自南北朝时期的《晋中兴书》和《魏书》，但到了唐代，“骑虎难下”就犯忌了，被改成“骑兽难下”，连杭州的虎林，也被改叫“武林”。

读者或许会问，大诗人李白在《留别广陵诸公》一诗中有“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之句，是否生性狂傲、我行我素的诗仙胆大妄为不怕“避讳”？错矣，其实李白原诗是“骑兽不敢下”，而现今流行的李白诗集是唐朝灭亡后重新编印的，此时时过境迁，已无须避讳了。

另外如李白的“欲往泾溪不辞远，龙门蹙波虎眼转”，刘禹锡的“汴水东流虎眼文，清淮晓色鸭头春”等等，在当初都是用“兽”字代替“虎”字的。

现在网络和其他媒体用语中经常形容某强势之人称之为：“牛人”。实际上在古代“牛人”是一低级官位，不“牛”。《周礼》中，地官有“牛人”一职，春官有“鸡人”和“龟人”，夏官有“羊人”，秋官有“犬人”。书中写道：“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宾客供膳牛；军事供犒牛；丧事供奠牛……”“牛人”根据牛角的发育程度，判断牛的老幼从而区别牛的等级，分别用于祭天祀神、迎宾以至犒赏战士等不同用途：“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

『牛人』曾是一种职务

古代的“官”和“吏”

狭义上讲,官是在政府、军队中供职且在一定等级之上的人员,吏则是低级公职人员。西汉时期,丞相和太尉岁俸万石,月俸六万钱,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者,被称为“斗食佐吏”。有时,吏还要受到一定的歧视,如唐宪宗时曾规定,曾任州府小吏者,不得参与进士科

考试。

再以清代为例。清代的官分九品,同一品中再分正从,共有十八级官阶,从九品之下还有“未入流”的官,他们都经由吏部、兵部铨选并任用,称“官”或“官员”。没有经过两部铨选并任事者,如内阁供事以及各部院的经承、书吏、承差、典吏、攒典等,则称“吏”或“吏员”。

·解字

“七”



“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这个“七”字本为象形字。甲骨文①是横切一刀、竖切一刀的样子,颇像后世的“十”字。②是金文的形体,同于甲骨文。③是小篆的写法。④为楷书的写法。

《说文》:“七,阳之正也。”其实,这并非“七”字的本义。“七”的本义为“切”,但到后世被借为数字用了,如《庄子·应帝王》:“人皆有七窍。”这是说:人都有耳、目、口、鼻七孔。中医学把喜、

怒、忧、思、悲、恐、惊称为“七情”。另外,古代还曾把“七”作为一种文体,称为“七体”,这是赋的另外一种形式。比较有名的“七体”,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王粲的《七释》,左思的《七讽》等。《昭明文选》还把“七”列为一门。这种“七体”文,最初是西汉枚乘作《七发》来启发楚太子,所以后人也就效法这种文体,作讽劝的文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重农抑商,但宋朝开国就对工商业经济十分重视,这也使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空前繁荣。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将商业化社会的建设推向了高峰。

明代的财政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它由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一手设计,可称为“洪武型”财政经济政策。其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财政经济退回到以广大小农经济为基础,可以说是宋朝政策的“大跃退”。

朱元璋痛恨王安石变法,他曾说:“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农抑商,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广大农村为财政税收之基础,将大帝国建筑在小农经济之上,厉行节俭,注重均平。明朝统治者打击工商业,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百姓不许航海,对外贸易以进贡名目由礼部掌管。朱元璋又连兴大案,打击富豪,“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这样就确立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基础,保证了帝国农业自然经济的本位。

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发展商业,不再追求用提高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效率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完全回到小农经济时代。这样的经济就只能在数量上膨胀,而没有效率和质量上的实质性进步了。这样做政治上确实简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和政治控制,但文明也几

乎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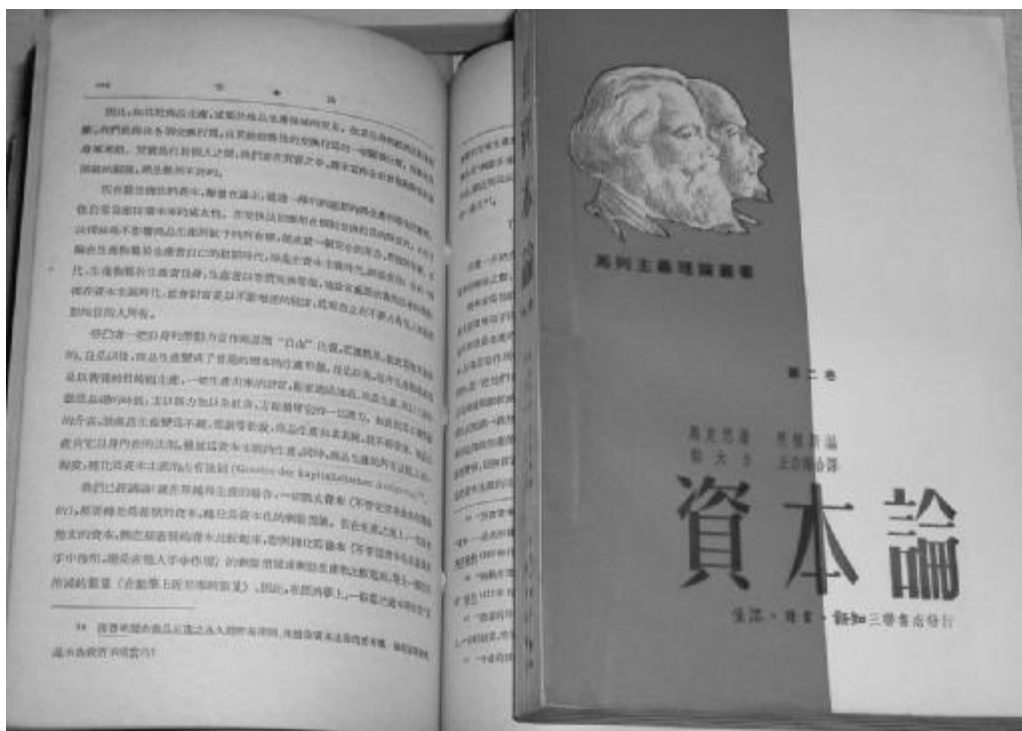
自此,全国变成无数个村庄之集合,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除了千万个小农家庭,就是统治者。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没有独立性的中间团体的阻隔,没有中层的商业代理机构及各种审计、会计机构的监督,也没有适当的司法程序来维护,政府机构又由一班文学之士来主持,对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很难做到切实了解。

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又有较显著的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尽管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远不及宋代。明代整个“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

明政府在摒弃商业化管理手段、将社会组织机构尽量简化的情况下,面对越来越繁复的社会事务,找不出恰当的技术手段来处理,就对道德纪律、意识形态进行空前强化。以现代眼光来看,明代本该用技术手段如民商法律来解决的问题,都统统归结到道德价值上去,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问题,以道德代替了法律。

明帝国政治彻头彻尾地文人化,处处以道德伦理相标榜,这样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专制、虚伪、不切实际的程度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可以说,这正是明代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结果。

明代 的「大跃退」



《资本论》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马克思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却提到了一个中国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马克思讲到铸币、价值符号、直接从金属货币流通中产生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时，写了一个编号为 83 的附注，这个附注的译文是：“户部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 1854 年 4 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清嘉庆三年(1798 年)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

他幼年入私塾，读书非常勤勉。道光十年(1830 年)，长辈决定，让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他边管理边读书，第二年即以监生资格进京应试，中了举人。过一年再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备官户部。

但在此后长达 15 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中低级官职。直到 50 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其后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理钱法堂(铸造和印制货币)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 30 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一直没有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在京城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咸丰元年(1851 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加剧。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 年)五月发行了民间无法向政府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年

底发行了同类性质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面对如此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思补救对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目的是为了“通商情,利运转”。他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王茂荫两次主张货币改革,遭到咸丰皇帝的训斥,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被当时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巴拉第得知。巴拉第是俄国19世纪的汉学家和传教士。作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的神职人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中搜集到有关王茂荫的货币改制过程与有关奏折事项,由下属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于1857年出版。

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并重新起了

个书名,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这本书被马克思注意到了。马克思就是根据该书德文版,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资本论》中。

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陈启修先生,把马克思笔下的 Wan—Mao—In 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万卯寅是何许人也?在清代的大臣里面查无此人。

由于对著作《资本论》的高度重视,也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资本论》中译本在20世纪30年代一问世,考证工作便开始了。经过郭沫若等的细致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老家就在安徽歙县。在20世纪50年代,吴晗更是把王茂荫誉为“清代货币改革者”。一些历史学家还对安徽歙县进行考察,从王茂荫后代那里收集和抄录了有关奏折等第一手资料。

·知识窗·

何谓“文章”

在古代,“文章”一词与现代意义迥异。“文”和“章”都是指带有彩色的条纹图案,红蓝相间叫做“文”,红白相间叫做“章”,“文章”二字连用,即指色彩斑斓的图画。“文章”被译为现

在的文字作品之意,始于汉代。那时,社会上崇尚文学风气极浓,人们都喜欢用“文章”来赞美那些文采华丽的作品。久而久之,就演变到今天的“文章”——专指文字作品的固定名词了。



古代的计时和报时

◎ 王耀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先民经过不断的社会实践，创造并逐步完善了圭表、日晷和滴漏等计时仪器。

利用圭表和日晷计时，是我国古代最原始的计时方法。从已经考古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距今约 6000~7000 年前，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就已经掌握了立竿测影的方法。目前，我们还能看到我国最早的测影计时遗址，是河南省登封县周公庙内的“周公测景台”。

圭表是中国古代测量日影长度以定方向、节气和时刻的天文仪器。包括圭和表两部分：表是直立的标杆，圭是平卧的尺。其构造是把圭平放在石座上，把表分别立在圭的南北两端。甲骨文有“日至”，《左传》有“日南至”的记载，最晚在春秋时已使用圭表测量连续两次日影最长或最短之间所经历的时间，以定回归年长度，成为编历的重要手段。为了提高影长量度的精确度，历代都对圭表有所改进，而改进最大的则是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他大大地突破了圭表的传统高度（一般为 3 米），创立了高达 13 米的圭表，并设置解

决“表高则影虚而淡”的困难，使观日影计时达到空前发展的程度。此后，明朝万历年间，又在兰州建造了高达 20 米的木表，成为我国历史上最高的圭表。现陈列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圭表，是明正统年间（1437~1442 年）所造。

日晷，又称日表，古代依据日影以测定时辰的仪器。《后汉书·律历志上》：“记称大桡作甲子，隶首作数，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万事。”日晷由晷盘和晷针组成。晷盘是一个有刻度的盘，中央装一根与盘面垂直的晷针。中国的日晷独具特色，晷盘为平行于赤道面，倾斜安放的圆盘；晷针为指向南、北极方向的金属针。针影随太阳运转而移动，刻度盘上的不同位置表示不同的时刻。

无论圭表还是日晷，都离不开依靠阳光照射而取影计时。在晴天有太阳时，可以使用，若遇到晨、昏、阴、晦、雨、雪天气，便失去效用。现在农村有些老人，一看日影照射的地方，就能说出与钟表相近的时间，这就是古老计时的遗风。

漏壶，又名“漏刻”、“刻漏”、“壶漏”。是我国古代利用水的流速来记量时间的一种仪

●知识窗●

器,比之圭表、日晷计时要先进、准确,它克服了日晷、圭表计时的缺点,在什么天气都可以使用。漏壶分为两种:(1)单壶,只有一个储水壶,水压变化大,计时精度低(约一刻)。中国和埃及均有出土。中国发现的有,陕西兴平漏壶、河北满城漏壶和内蒙古伊克昭盟漏壶,都是西汉初期(约公元前100年)的计时工具。(2)复壶,为两个以上的储水壶。著名的为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漏壶,由四个铜壶自上而下互相叠置而成。上面三壶底部有小孔,最上一壶装满水后,水即逐渐流入以下各壶,最下一壶内装一直立浮标,上刻时辰,水逐步升高,浮标也随之上升,由此可知道时辰。《周礼·考官》已有设官管漏刻的记载。可见早在周代已使用漏壶测定时刻,明以后有了钟表才废弃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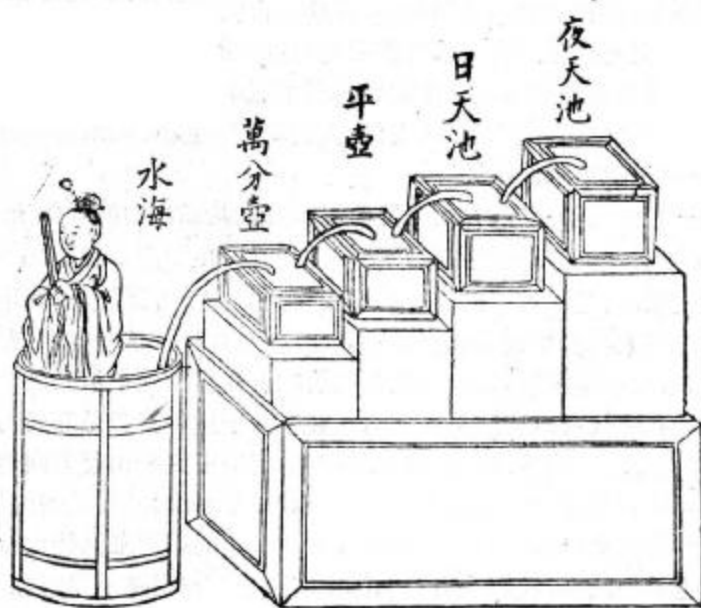
在中国古代,都城、大小城市及各寺院,都建有钟鼓楼,在楼上设有滴漏计时,陈设大型的钟鼓,向人们报时,所谓晨钟暮鼓,清晨闻钟声而起,入夜闻鼓声而息。古代钟鼓楼建置和打钟击鼓,都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

唐代的都城长安,规模宏大。在中央机关办公的皇城门外,建有钟鼓楼,利用漏壶计时,设有钟鼓报时。诗人白居易在《直中书省》诗中这样描写道:“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在皇帝居住的大明宫前,建有高大而对称的阙楼,阙楼上置有漏壶计时、钟鼓报时。宫内设有报晓卫士,头戴大

红色的绛帟,人们称为鸡人,诗人岑参“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描写早朝时的盛景。在长安城内直通十二城门的大街上,设有街鼓,天将明时,擂鼓3000声,坊市门启;日暮时,击鼓800声而门闭。每到夜晚街鼓鸣后,所有的行人都必须回到坊内,关闭坊门,即所谓“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

到了宋元时期,人们还是利用滴漏计时,利用钟鼓之声报时。

明代,我国仍采用漏壶计时。明代在京都和各大小城市的中心地方,建有高大的钟鼓楼,在楼上放有精致的漏壶计时器,放置大型的钟和鼓,漏壶上时刻一到,就用响亮的钟鼓声向全城人民报时。现在西安城内高大雄伟的钟楼和鼓楼,都是明代修建的报时楼。明代后期,随着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发展,人们向来自中国的西方人,学习并掌握了生产钟表的技术。明代以后,我国有了钟表,代替了铜壶滴漏计时和利用钟鼓之声报时。



“胜券”为何物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齐相孟尝君田文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接纳天下贤才，以致府中养有食客三千，客多邑少，每天开支巨大，渐渐有些吃不消。为备开支，田文就打算派人到自己的封地薛国收债。传舍人推荐了食客冯谖。于是冯谖带着债券就去了薛地，召集邑中所有欠债人都来合券对账。冯谖根据欠债人的情况，给有能力还债的人重新约定了日期，而对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则把手中所持的债券烧掉不再要求偿还。

其实，古代的债券就是现在所订立的合同，是一种契约。人们为了买卖或确立债权债务关系有所凭证，双方就要订立债券。债券用竹筒做成，上面书写所要订立的内容，然后分

为左右两片，双方各执其一，左片称为左券，由债主收执，作为以后索债的凭证；而右券则由借债人收执，作为偿还债务的凭证。讨债或还债时，双方都要拿出各自收执的债券，合在一起，确认债券有效后，双方就可以履行各自的权利或义务了，债结清后，债券随之焚毁作废。

清朝文学家方苞在《颂铭》中说“决胜千里，如操左券”，可谓是对“左券”一词所作的恰当诠释。因此，“胜券”也作“左券”，“左券”即是“胜券”。宋朝的爱国大诗人陆游在《离言打麦作饭》中也说：“人生为农最可愿，得饱正如持左券。”大诗人的人生愿望是那么朴素和实在，只求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能够吃饱饭就会像别人欠了自己钱一样高兴了。

·名句欣赏

(1)【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

淫佚：纵欲放荡。

(2)【政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三国志·魏书·杨阜传》

(3)【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惟：惟独，只有。 邦：国。 本：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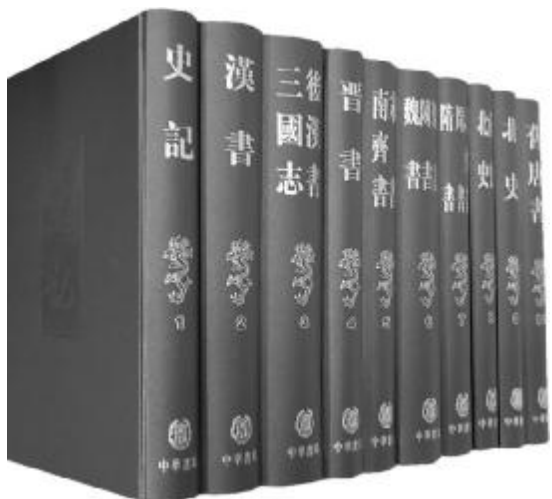
(4)【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史记·赵世家》

制国：治国。 常：不变的原则。 从：从事。 经：常道，规范。

(5)【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唐·吴兢《贞观政要·君道》唐太宗语

存：存恤。 奉：供奉。 啖：吃。



“二十四史”指哪些史书

现了“十三代史”之说。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就形成了“十七史”之说。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上先前的各史,总名为“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在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学者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旧五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也被列入正史,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由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总计 3213 卷,约 4000 万字,都是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而成的史书。

二十四史是指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由不同的历史学家撰写的而被封建朝廷列入正史的二十四种史书的总称。三国时期,当时社会上就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编撰的《东观汉记》。范晔的《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东观汉记》,成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陈寿的《三国志》,就有了“前四史”之说。唐朝官修南北朝八史和《晋书》成,再加上之前的前四史,就出

魏晋士人名字中何以多带“之”字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王羲之的后代子孙们的名字中大都含有“之”字,如五个儿子分别叫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

而且,魏晋时的显阔士人,名字里往往都带一个“之”字,如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裴松之、东晋时著名将领刘牢之、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名字里都有“之”字。

魏晋时人在名字中习惯用“之”字,与一种叫“五斗米道”的秘密宗教有直接关系。“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是中国早期道教派别之一,其创始人是张陵。因为起初入教者都需

要交纳五斗米作为入教信物,故俗称“五斗米道”。

张陵的孙子张鲁归降了曹操,被曹操封为镇南将军,曹操还与张鲁结为亲家。因为这层原因,“五斗米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东晋时已成为第一大教。王羲之家族当时也信奉“五斗米道”。

当时,加入“五斗米道”的士人很多,并以自己是“五斗米道”的信徒为荣,有识之士便开始在名字中使用“之”字,作为入教人士的一种暗记。父子、祖孙、兄弟同加入“五斗米道”,名字中便会都有一个“之”字。

中国人过生日始于何时

翻开史籍,魏晋南北朝之前,我们找不到过生日的记载,人们也没有“生日”这种意识。专讲礼仪的《仪礼》、《礼记》、《周礼》均无生日礼。

魏晋以后,陆陆续续有了生日的说法。《颜氏家训·风操篇》中提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人们已经流行在生日这天大吃一顿,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有了在每年生日这天庆祝的做法。

入唐以后,唐玄宗以自己的生日为“千秋节”,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此后历朝皇帝纷纷效仿,相沿成习。

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的传入是一个大事件,它在很多方面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恰恰也是兴起于魏晋,唐朝以后大盛。佛教文化很重视誕生日。很

多佛教节日实际上就是各个佛和菩萨的誕生日。如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这些佛教节日也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南北朝时,在佛誕生日浴佛已经成为荆楚一带的习俗,除了浴佛,佛誕生日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行像”,就是用宝车载着佛像巡行城市街衢的一种宗教仪式。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中国人的意识里,一个人的出生日期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不需要去纪念它。而佛教的习俗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佛祖的誕生日是四月初八,我的誕生日是哪天呢?佛祖誕生日要“浴佛”、“行像”,我的誕生日能不能也搞点特别的仪式呢?这种观念,就是中国确立生日习俗的思想基础。

圆公章的来历

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一成立,周恩来便要求设计筹委会的公章,因为会议通知、来往函件等都要加盖公章。

过去,公章叫做“关防”,大多是方形或长方形,有宽宽的红边,用起来很笨重,而且不好看。接到设计公章的任务后,设计人员想:新中国即将成立,应该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有一个新的面貌。

设计人员在苦苦思索时,突然想起设计的中南海出入证是圆形的,中间有一颗星,于是设计人员在圆形的边框内,将“新政治协商会议”7个字排成弧形,下面横排“筹备委员

会”5个字,正中偏上是一颗五角星。

画好之后,设计人员将这个图案亲自呈送周恩来审查,周恩来看了之后很高兴,并称赞设计很有新意。

开国大典以后,几乎全国的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都模仿这枚公章的样式刻本单位的公章,圆公章蔚然成风。

从此以后,全国所有的公章几乎全改为圆形,中间都有颗红五角星(代表党的领导),甚至生产出大量的橡皮公章印坯,有各种大小不一的型号供选择,它们大都用仿宋字体,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



世博会的由来

世界博览会又称国际博览会,简称世博会、世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世博会被誉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

世博会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最初以美术品和传统工艺品的展示为主,后来逐渐变为荟萃科学技术与产业技术的展览会,成为培育产业人才和一般市民的启蒙教育不可多得的场所。世界展览会的会场不单是展示技术和商品,而且伴以异彩纷呈的表演,富有魅力的壮观景色,设置成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充满节日气氛的空间,成

为一般市民娱乐和消费的理想场所。

公元5世纪,波斯举办了第一个超越集市功能的展览会。

18世纪,随着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人们逐渐想到举办与集市相似,但只展不卖,以宣传展出新产品和成果为目的的展览会。

1791年捷克在首都布拉格首次举办了这样的展览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展览会的规模也逐步扩大,参展的地域范围从一地扩大到全国,由国内延伸到国外,直至发展成为由许多国家参与的世界性博览会。

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展览会以来,世博会已先后举办过40届,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第41届。

·解字

“十”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个“十”字原为象形字。①是甲骨文的形体。中国古时往往以一掌代表“十”,所以“一”也正是一掌的侧视形。②是金文的形体,郭沫若认为:“亦掌之象形也。”是掌的正视形,中间宽。③是小篆的写法,中间变成了一横。④是楷书的形体。

《说文》:“十,数之具也。”这是说:“十”数,是一个很完备的数。但许慎对

“十”的形体分析为:“一为东西,一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这只是依据小篆的形体强作臆测,不足信。“十”是完备的数,又可以引申为“完满具足”的意思,如“十足”、“十分”、“十全十美”等。古籍中有时也以“十”代“什”,那是杂取各种不同事物或不同样式配合成一个整体的意思,如“什锦橱”等。又如白斑《西湖赋》:“亭连栋为十锦。”可见“十”可作“什”的通假字。

省志民族志编修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陶利辉

民族作为一个动态群体,要按地方志的要求对其写出一本志书,比写其他的专志要难得多,因为面对的记述对象是一个动态的群体,像民族的价值观变化、心理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目前,对省志民族志的编修有两种构想:第一种方案是篇目设计上将世居民族各自的情况,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横分门类,然后将各民族的资料归入其中编写。这种方案比较符合地方志横排竖写的特点,但缺点是,就某一个民族的材料而言,由于资料被分散到互不关联的门类中,造成具体到某一个民族的民族志而言整体性和系统性相对较差。同时,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各世居民族民主改革前历史发展进程不一,使同一个门类中各民族相应的内容篇幅大小不一。第二种方案是将某一个省级行政区内各世居民族的民族事务管理、区域自治、民族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设篇集中记述,各世居民族单独设篇处理。这种设

计优势在于,民族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得到了强化,不足的是,整个志书前半部分记述掌控难度大,后半部分又由于民主改革以前各世居民族历史进程的差异,篇目难以达到一致性,且与志书横排竖写的原则有一定距离。综合而言,目前不少的省志民族志采用了第二种架构。针对省志民族志的编修实际,在具体的编修工作中应从以下途径去思考:1.根据世居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在篇目设计中采用不同的模式。克服因过分强调篇目的一致性带来有些民族在章节的内容上空洞无物的尴尬局面。2.记述上处理好综述与分述、概括性和典型性个案的巧妙结合。用文化人类学个案研究,精选少数在成员构成方面完全是记述对象主体的村社作为资料采集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并将形成的成果作为典型性材料置于相应的章节,增强志书的资料价值和学术品位。3.适当借鉴文化人类学有关民族志编写的有益模式。

登科后



◎ 孟 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751~814),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祖籍平昌(今山东临邑东北),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早年生活贫困,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贞元中张建封镇徐州时,郊曾往谒。46岁始登进士第。后东归,旅游汴州(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贞元中任为溧阳尉。在任不事曹务,常以作诗为乐,被罚半俸。元和初,河南尹郑余庆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60岁时,因母死去官。郑余庆镇兴元,又奏为参谋、试大理评事。郊应邀前往,到阆乡(今河南灵宝),暴病去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诗与韩愈并称“韩孟”。有《孟东野诗集》。

孟郊46岁那年进士及第,他自以为从此可以别开新生面,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一番了。满心按捺不住得意欣喜之情,便化成了这首别具一格的小诗。这首诗因为给后人留下了“春风得意”与“走马看花”两个成语而更为

人们熟知。

按唐制,进士考试在秋季举行,发榜则在下一年春天。这时候的长安,正春风轻拂,春花盛开。城东南的曲江、杏园一带春意更浓,新进士在这里宴集同年,“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唐摭言》卷三)。新进士们“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赵嘏《今年新先辈以遏密之际每有宴集必资清谈书此奉贺》)。可知所写春风骀荡、马上看花是实际情形。但诗人并不留连于客观的景物描写,而是突出了自我感觉上的“放荡”:情不自禁吐出“得意”二字,还要“一日看尽长安花”。在车马拥挤、游人争观的长安道上,不可能容得他策马疾驰,偌大一个长安,无数春花,“一日”是不能“看尽”的。然而诗人尽可自认为当日的马蹄格外轻疾,也尽不妨说一日之间已把长安花看尽。虽无理却有情,因为写出了真情实感,也就不觉得其荒唐了。同时诗句还具有象征意味:“春风”,既是自然界的春风,也是皇恩的象征。所谓“得意”,既指心情上称心如意,也指进士及第之事。诗句的思想艺术容量较大,明朗畅达而又别有情韵,因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为后人喜爱的名句。